

不列顛古史辯—— 十六世紀蘇格蘭古史書寫的知識史

林美香*

本文從知識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十六世紀蘇格蘭的古史書寫，並將其置於跨國知識辯論的脈絡下，分析其書寫形式及核心議題。本文將此知識辯論稱為「不列顛古史辯」。對蘇格蘭史家來說，這是一場捍衛蘇格蘭政治獨立與自由的辯論，但其古史建構與論述的過程卻非單獨發展，而是在與英格蘭古史書寫的對立與交流中，發展出相應的特色。本文首節從蘇格蘭中古以來對古史的動員開始談起，第二節從辯論的網絡說明十六世紀蘇格蘭史家與英格蘭或歐陸學者的知識連結，以及各自在這場辯論中所處的位置。第三節聚焦於古史辯參與者共享的文藝復興學術背景，以及對語言和文獻問題的爭辯。第四節討論古史辯中兩項關鍵議題：島嶼名稱由來及主要族群遷徙之先後。本文的主旨不在於判定誰所寫的古史更接近真實歷史，而是探究書寫者在何種知識脈絡中、透過何種方式，讓古史在當下展現「過去的力量」。

關鍵詞：英格蘭、蘇格蘭、歷史書寫、知識史、起源神話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古史的動員

從九世紀以來，不列顛島上便存在兩個王國——英格蘭與蘇格蘭，但十一世紀以後，隨著英格蘭政治勢力的擴張，英格蘭君主時有收編或統一蘇格蘭王國的行動。¹最明顯的兩個時期，分別是十三、十四世紀愛德華一世(Edward I, 1272–1307 在位)至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1327–1377 在位)時期，及十六世紀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1547 在位)至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1547–1553 在位)時期。在此過程中，英方的「大不列顛帝國」(Empire of Great Britain)概念日趨成熟，其以英格蘭為主體向外擴張，在宗教改革之後，

¹ 中文用詞說明：(1) 本文牽涉上古時期不列顛及愛爾蘭兩島，並以不列顛為主要討論區域。約九世紀時，不列顛島上形成英格蘭與蘇格蘭兩王國，前者以盎格魯·薩克遜人(Anglo-Saxons)為主要統治階層，後者主要由「蘇格蘭人」(Scots)與「皮克特人」(Picts)組成，原稱為「阿爾巴王國」(Kingdom of Alba, 900–1286)，其統治區域在中古時期也被稱為「阿爾巴」(Alba)，起初僅及於蘇格蘭高地區，未涵蓋今日蘇格蘭全境。在十世紀之前，所謂的「蘇格蘭」或拉丁文的「斯科提亞」(Scotia)，指的其實是今日的愛爾蘭；而「蘇格蘭人」一詞，至少在十四世紀之前，可同時指愛爾蘭及由愛爾蘭遷移至蘇格蘭的民族。以王國名稱而論，因十六世紀蘇格蘭史家將自己的王國視為古代蘇格蘭王國的延續，因此本文仍維持「蘇格蘭王國」之稱。以族群而論，不列顛上古時期主要有三——不列顛人(Bretto 或 Britons)、蘇格蘭人(Scotti 或 Scots)、皮克特人(Picti 或 Picts)，但前兩者易與今日所謂的不列顛人、蘇格蘭人相混淆，因此本文將古代主要居住於今日英格蘭地區的族群譯為「布立吞人」，傳說中源於特洛伊人布魯特斯(Brutus)；居住於蘇格蘭西部高地區的族群，則稱為「斯科特人」，傳說中源於埃及公主斯科塔(Scota)。另一支民族，今已難尋蹤跡，則維持「皮克特人」的稱呼。但本文所提及之著作或歷史發展，若跨越十四世紀之後，仍以「蘇格蘭人」稱之。(2) 上述各「民族」或「族群」，在中古至近代早期文獻中的拉丁文是 *gentes* 或 *nationes*，兩詞並無清楚區隔，皆指有相同起源與文化的一群人，但未必組成單一國家。本文之中文用法視上下文使用民族或族群，若與政治體有較密切關係時使用「國族」一詞。

更是一個以「新教」(Protestantism)為基礎的帝國。²在政治、軍事及宗教行動之外，此不列顛帝國的夢想，也依靠歷史的動員，且多以古史為武器，以渺遠不可考的傳說為真實的民族起源，由此證明統治另一族、另一王國的合理性。英方的古史動員，從中古至十六世紀，皆以十二世紀傑弗瑞(Geoffrey of Monmouth, c. 1095–c. 1155)所寫的《不列顛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c. 1138)為本，主張不列顛國族源自特洛伊英雄布魯特斯(Brutus)。他大約於西元前 1200 年建國，統治全島的布立吞人(Britons)；過世後將領土分割為三：長子洛克瑞烏斯(Locrinus)統治今日英格蘭地區、次子卡姆伯(Kamber)分得威爾斯、幼子阿爾巴納克特斯(Albanactus)治理蘇格蘭。但長子世系(即英格蘭君主所傳承之政權)始終享有優位，且亞瑟王(King Arthur)曾征服蘇格蘭，進一步證明英格蘭君主握有對蘇格蘭的統治權。³

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自問世以來，便成為英格蘭君主在不列顛內部殖民的歷史武器，是古史動員最重要的軍力，用以捍衛英王在不列顛全島的統治權，也構築了不列顛政治統一的夢想。其相關論述通常被稱為「不列顛大事」(Matter of Britain)或「英格蘭大事」(Matter of England)。⁴然而歷史的動員，並不是擴張或壓迫一方的專利，時常受威脅的蘇格蘭，在歷史上也不斷藉著古史的建構與重述，抵擋英格蘭君主的野心。他們反駁英方的論述一般稱為「蘇格蘭大事」(Matter of Scotland)

²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0.

³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trans. Michael A. Faletra (Ontario: Broadview Edition, 2008), 59, 168–173.

⁴ R. R. Davies, *The Matter of Britain and the Matter of England: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9 February 199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Power and Identities in the British Isles 1093–13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42.

或「達爾里阿達大事」(Matter of Dál Riata)。⁵

這兩相對立的論述，具體而微地呈現在 1301 年因教宗包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 1294–1303 在位)而展開的古史辯論。辯論的起因是教宗為保護蘇格蘭免於愛德華一世的統治，在 1299 年發布訓諭，宣告「自古以來」蘇格蘭的國土屬於羅馬教會，而非屬於英格蘭國王，並要求英王回應。⁶愛德華一世遲至 1301 年 5 月才以書信答覆教宗，他的回覆同樣著力於「自古以來」，從先知以利和薩姆耳(Eli and Samuel the prophet)的時代說起：那時「特洛伊族」(the Trojan race)的布魯特斯，來到阿爾比恩(Albion)，擊敗巨人族，在此建立了統一的國度，並以布魯特斯之名將王國及其領土稱為「不列顛」。接著，這封信說明布魯特斯過世後的分封、長子的優位權、亞瑟王的征服，以及歷朝歷代蘇格蘭

⁵ R. James Goldstein, *The Matter of Scotl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Medieval Scotlan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 Colin Kidd, "The Gaelic Dilemma in Early Modern Scottish Political Culture," in *British Identities Before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tlantic World 1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3. 達爾里阿達是西元 500 年左右，愛爾蘭的移民在蘇格蘭西部海岸及島嶼地區建立的小王國，領土也包括愛爾蘭北部及東北沿岸，後來的「阿爾巴王國」即以此為起始。從十世紀開始，蘇格蘭的古史論述中，將達爾里阿達的歷史大幅往前推移，與愛爾蘭更古老的王室系譜相連結，使蘇格蘭人與愛爾蘭人同為蓋爾人(Gales)的分支，擁有相近的語言、文化及共同的祖先：來自古代埃及的斯科塔(Scota)及其來自希臘的夫婿戈德爾·格拉斯(Goidel Glas)(或拉丁文名為蓋提祿斯[Gaithelus])，後者也成為蓋爾人及蓋爾語(Gaelic)名稱的由來。參見 Dauvit Broun, "The Birth of Scottish History,"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76:201 (April 1997): 4–22; *The Irish Identity of the Kingdom of the Scot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Woodbridge: Boydell, 1999).

⁶ "Bull of Pope Boniface," in *Anglo-Scottish Relations 1174–1328: Some Selecte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E. L. G. Ston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3.

國王向英王行效忠禮的事實，在在闡明：「從最古的時期開始，英格蘭的國王……[就]掌有蘇格蘭領土及其國王在世務事務上的宗主權」，並「在此島嶼上享有君權及支配權。」⁷

對於英王的主張，蘇方代表向教宗指出：有關歷代蘇王向英王行效忠禮的各個案例，完全沒有真實的歷史證據支持。他們並不反對布魯特斯建國之說，也不否認亞瑟王曾征服蘇格蘭，但首先，布魯特斯的三子三分天下，彼此的政治關係是平等的，沒有誰優於誰；其次，儘管亞瑟曾征服蘇格蘭，但亞瑟過世後，蘇格蘭便回復其舊有的「自由狀態」。⁸在提出不同的詮釋之外，蘇方代表也為蘇格蘭古史增添新內容，指出三子分封之後的一段時日，埃及法老的女兒斯科塔(Scota)偕其夫婿蓋提祿斯(Gaithelus)，帶著大批族人離開埃及，在海上航行多日，經過西班牙抵達愛爾蘭，再從愛爾蘭來到不列顛，並征服了奧爾巴尼(land of Albany, 即阿爾巴納克斯受封之地)。斯科塔以自己的名字將此地命名為「蘇格蘭」，其子民則稱為「斯科特人」(Scots)，並結合長子艾爾克(Erc)和丈夫的名字，將最初抵達之地命名為阿蓋爾(Ergaill, 即 Argyll, 在日後的達爾里阿達境內)。自此，「斯科特人做為一支新民族，擁有新的名號，與布立吞人毫無關聯。」再者，這支新民族與當時另一支居住於蘇格蘭的民族——皮克特人(Picts)結盟，擊潰布立吞人與羅馬人的聯軍，雙方最終以羅馬人所建的長城分隔。所以，「未曾有任何時候，蘇格蘭臣服於布立吞人的宗主權之下。」即便到了薩克森君王(Saxon kings)統治的時代，蘇格蘭也始終「維持自由、不受屈服」；至諾曼君主(Norman kings)時期

⁷ “Letter of King Edward I to Pope Boniface VIII,” in *Anglo-Scottish Relations 1174–1328*, ed. and trans. E. L. G. Stones, 195–197.

⁸ “The Pope and the Scottish Question,” in *Anglo-Scottish Relations 1174–1328*, ed. and trans. E. L. G. Stones, 227.

亦如是。⁹

蘇方代表在他們的反駁中對古史的敘述相當簡略，未說明斯科塔出現的時間，對皮克特人也毫無交代，但其中所述之起源傳說，與布魯特斯傳說的建構模式十分相似，可能是從對方學習來的產物。¹⁰兩者皆以海外遷徙來的民族所締造之王國，做為國族歷史的開端，其國名與族群名都跟隨創建者之名。而且，兩民族又能與更古老的血統相聯繫：布魯特斯承接了古代特洛伊英雄世系；斯科塔則與《舊約聖經》中摩西時代古埃及法老的血脈相連結。如此古之又古的傳承，賦予中古英格蘭或蘇格蘭的國家主權，一份深具時間重量的權威，彰顯其政權的延續性與合法性。此效用一如史家戴維斯(R. R. Davies, 1938–2005)所言：在以古為尊、以古為評判標準的社會中，「對過去的控制及利用，關乎現時此刻的可信度」，並使「歷史傳說也成為政治宣言」。¹¹蘇格蘭代表在教廷中所言，正是以自己創發的古史，表達對國家獨立性的追求。

1301年之後，蘇格蘭仍多次面對英格蘭宗主權及統治權的脅迫，在斯科塔傳說的基礎上，蘇格蘭官方及歷史書寫者繼續藉著對古史的「控制及利用」，主張蘇格蘭完全獨立於英格蘭。例如，蘇格蘭「獨立

⁹ “The Pope and the Scottish Question,” 227, 229. 蘇方代表承認蘇格蘭臣屬於羅馬教會，但不受其他世俗權威統治。“The Pope and the Scottish Question,” 233, 235.

¹⁰ 此種古史建構模式通行於羅馬帝國在歐洲西部衰微之後。參見 Richard Waswo, “Our Ancestors, the Trojans: Invent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 *Exemplaria* 7 (1995): 269–290. 十四世紀蘇格蘭古史對英格蘭的仿效，參見 Katherine H. Terrell, “Subversive Histories: Strategies of Identity in Scottish Historiography,” in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British Middle Ages*, ed. J. J. Coh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53–172.

¹¹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41, 44.

戰爭」(the Wars of Independence, 1296–1328)期間，蘇格蘭貴族以全王國之名(the whole community of the realm of Scotland)，致信教宗若望二十二世(Pope John XXII, 1316–1334 在位)，信中聲明蘇格蘭王國自建國以來，始終維持獨立而自由的狀態。此信日後被稱為《阿布羅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 1320)，宣言主文的第一段便以古史為證：

最神聖的教宗，我們從古人遺留的編年史和書籍中得知，我們斯科特人在列國中享有廣大的名聲。[斯科特人]從大斯基泰(Greater Scythia)經過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和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在西班牙居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身處最野蠻的人之中，但不論這些人多野蠻，[斯科特人]從未在任何地方被征服。在以色列人渡過紅海之後的 1200 年，[斯科特人]終於抵達他們在西邊的家。……他們先是驅逐布立吞人，接著徹底擊潰皮克特人；雖然他們時常遭受挪威人、丹麥人和英格蘭人的襲擊，但以多次的勝利和無言的奮鬥，守住了家鄉。一如古代史家所見證的，他們的王國自始自終未受奴役，且已有 113 位君王統治，皆出自他們自己的王族，此世系從未被任何一個外國人所打破。¹² 這段話闡述了蘇格蘭祖先是一支遷徙的民族，從斯基泰地區至埃及，

¹² 《阿布羅斯宣言》可能是在蘇格蘭東岸的阿布羅斯(Arbroath)所起草，故有此稱。譯文依據蘇格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的拉丁文及英文版本：“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Arbroath,” <https://www.nrscotland.gov.uk/learning-and-events/the-declaration-of-arbroath/transcription-of-the-declaration-of-arbroath/>, accessed November 13, 2025. 另可參考 Edward J. Cowan, *‘For Freedom Alone’: The Declaration of Arbroath (1320)* (East Linton: Tuckwell, 2003), Appendix 1. 引文中的「大斯基泰」，一般是指西元前八世紀至三世紀斯基泰人所活躍的區域，大概在黑海以北，跨越東歐與西亞的大草原地帶，但在當時蘇格蘭人的想象中，也包括斯科塔的丈夫蓋提祿斯之家鄉——希臘。

再從地中海東岸至西班牙，最後定居於不列顛西北部的「家鄉」。它並未直接提到斯科塔，也略過愛爾蘭，但特別強調蘇格蘭自立國以來，一直由單一的王朝世系統治，延續到當時的國王羅伯一世(Robert I, 1306–1329 在位)，已有 113 位君主共約兩千年的漫長歷史。¹³這段簡要的古史敘述，後續在蘇格蘭史家手中，不斷增添血肉，如十四世紀編年史家富爾頓的約翰(John of Fordun, d. c. 1363)所編纂之《蘇格蘭人編年史》(*Chronica Gentis Scotorum*)。此作完成於 1380 年代，被視為首部蘇格蘭歷史重要著作，並奠定日後 300 多年蘇格蘭歷史書寫的根基。¹⁴

至十六世紀，蘇格蘭歷史書寫又在英蘇雙方頻密的衝突中，文藝復興人文主義(Humanism)的影響下，發展得愈加豐富；也因印刷術的出現而流傳得更廣。¹⁵代表性著作為布思(Hector Boece, 1465–1536)的《蘇格蘭

13 《阿布羅斯宣言》的內容顯示，當時蘇格蘭人相信自己的王國已有約兩千年的歷史，而且不將愛爾蘭當作蘇格蘭人的原鄉，選以蘇格蘭為上帝應允的「家」，此代表十四世紀蘇格蘭古史書寫的轉折，參見 Broun, “The Birth of Scottish History,” 11–14; Dauvit Broun, “The Picts’ Place in the Kingship’s Past before John of Fordun,” in *Scottish History*, 23–24.

14 Goldstein, “The Genealogy of Scotland: John of Fordun’s *Chronica Gentis Scotorum*,” in *The Matter of Scotland*, 104–132; Dauvit Broun, “A New Perspective o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a Gentis Scotorum* as a Medieval ‘National History’,” in *Rethinking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n Scotland: Essays in Honour of Roger A. Mason*, ed. Steven J. Reid (Woodbridge: Boydell, 2024), 43–60.

15 十六世紀是蘇格蘭文藝復興的時代，也是宗教改革的時代。相關研究見 Glanmor Williams and Robert Owen Jones, eds., *The Celts and the Renaissanc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0); A. A. MacDonald, Michael Lynch and Ian B. Cowan, eds., *The Renaissance in Scotland: Studies in Literature,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Offered to John Durkan* (Leiden: E. J. Brill, 1994); Ceri Davies and John E. Law, ed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Celtic Countries* (Oxford: Blackwell, 2005); Reid, ed., *Rethinking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n Scotland*.

人史》(*Scotorum historiae a prima gentis origine*, 1527)，及布坎南(George Buchanan, 1506–1582)的《蘇格蘭史》(*Rerum Scotticarum historia*, 1582)。前者大幅填補了十三世紀以來蘇格蘭古史中的空白，即大約西元前 330 年至西元後 420 年左右，約 750 年的歷史發展。若說布思的貢獻在「立舊」，布坎南的作品則在「開新」，他打破長久流傳的古史傳說，以新角度挖掘蘇格蘭國族歷史真實的起源。這兩人的作品自十六世紀起便成為蘇格蘭歷史書寫的權威，甚至對英格蘭史家也具有重要影響力，持續至十八世紀中。¹⁶

本文的主題即為十六世紀蘇格蘭的古史書寫。有關蘇格蘭的古史傳說及其政治意義，雖然華語世界對此並不熟悉，但在英語世界，從二十世紀末葉至今，已有不少研究。重要學者如梅森(Roger A. Mason)、崔佛-羅珀(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基德(Colin Kidd)、布朗(Dauvit Broun)、佛格森(William Ferguson)及皮托克(Murray G. H. Pittock)等史家，各有細緻且精彩的著作。¹⁷這些作品都提到英蘇之間長期政治對立的狀況，多將古

¹⁶ 十八世紀前蘇格蘭古史書寫的發展，可參考 Nicola Royan with Dauvit Broun, “Versions of Scottish Nationhood, c. 850–1707,” in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 vol. 1, *From Columba to the Union (until 1707)*, ed. Thomas Owen Clancy and Murray Pittock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8–183. 十八世紀後的辯論和變化，可見 Colin Kidd, *Subverting Scotland's Past: Scottish Whig Historians and the Creation of an Anglo-British Identity, 1689–c.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¹⁷ Roger A. Mason, “Scotching the Brut: Politics, History and National Myth in Six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1987), 60–84; “Civil Society and the Celts: Hector Boece,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Ancient Scottish Past,” in *Scottish History*, 95–119; Hugh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Myth and History*, ed. Jeremy J. Car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Kidd, *Subverting Scotland's Past*; Broun, *The Irish Identity of the Kingdom of the*

史書寫視為蘇格蘭國族認同重要的表達方式，亦是政治思想及政治宣傳的一環。因此，有學者將蘇格蘭的歷史寫作稱為「史學戰爭」(war of historiography)或「宣傳戰」(war of propaganda)，將歷史的對抗視為實體戰爭的延伸。¹⁸然而，即使蘇格蘭的古史發展與英格蘭如此密切相關，多數研究卻囿於蘇格蘭內部的知識系譜，強調從十四世紀的約翰·包爾(Walter Bower, c. 1385–1449)，¹⁹一路到十六世紀人文學者布思、布坎南的發展。本文主張，若要深刻了解蘇格蘭古史書寫的內容、課題、形式及其轉折，不能僅在國族認同的單一概念中理解，而應放在與其相對應的英格蘭古史書寫脈絡中兩相關照，才能深入理解其發展。

本文擬從知識史的角度，將十六世紀蘇格蘭古史書寫放在跨國知識辯論及交流中，重新理解其發展，也藉此了解文藝復興時期不列顛及歐洲對待古史的態度。如今方興未艾的知識史，所觸及之研究範疇日漸擴增，²⁰本文將特別著重古史如何在知識「辯論」的形式與脈絡

Scot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William Ferguson, *The Identity of the Scottish Nation: An Historic Que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Murray G. H. Pittock,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The Stuart Myth and the Scottish Identity, 163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¹⁸ Goldstein, *The Matter of Scotland*, 7;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14.

¹⁹ 包爾於 1440 年代編修約翰的編年史，出版為《蘇格蘭編年史》(*Scotichronicon*)，他將原本僅涵蓋古代至 1153 年的歷史，增補至 1437 年。現代版本見 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ed. William F. Skene; trans. Felix J. H. Skene (Edinburgh: Edmonstaon and Douglas, 1872); Walter Bower, *Scotichronicon*, 9 vols, ed. D. E. R. Watt (London: John Donald, 2022).

²⁰ 知識史從 1960 年代以來，不僅融匯傳統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和新興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且觸及面向日益擴大，包括知識的採集、整理、對比、驗證、表達、傳播、應用等，也關注知識的「默示」(tacit knowledge)、「遺忘」，甚至是無知。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A Social History of*

中，重新被檢視、建構、交換與再製。雖然知識辯論或爭議是歷史學中常見的題目，如上文提到的「史學戰爭」，但有關辯論本身如何形塑知識樣貌，較少見於歷史知識的研究中。比較常見的，是在科學知識史領域，例如謝平(Steven Shapin)與夏佛(Simon Schaffer)合著的《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1985)、拉圖爾(Bruno Latour, 1947–2022)和巫爾加(Steve Woolger)的《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86)、隆吉諾(Helen E. Longino)的《知識的命運》(*The Fate of Knowledge*, 2002)，以及達斯頓(Lorraine Daston)的《對手：科學家如何學會合作》(*Rivals: How Scientists Learned to Cooperate*, 2023)。這些作品雖有宏觀與微觀之異，但都帶有「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取向，強調知識建構的社會性(sociality)，因此多從知識社群出發，再談學者間的對決與競爭，或談彼此間的協商和合作。這些科學知識史的研究指出，透過爭辯或協力等各樣知識活動，特定知識社群得以取得共同界定「事實」的標準，或建立知識「可信性」(credibility)的原則，即使這些標準或原則無法在短時間內達成普遍的認同。²¹這些研究也顯示了知

Knowledge 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Ignorance: A Glob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²¹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譯本見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著，蔡佩君譯，《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爾與實驗生活》(臺北：行人出版，2006);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4–168, 175–183; Helen E.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37, 60–61; Lorraine Daston, *Rivals: How Scientists Learned*

識社群中的交流、批判，以及對一特定議題的相互詰問，可推動知識的進展並形塑其樣態，此正可用於理解十六世紀古史知識發展的歷程。

因此，本文將從辯論的角度切入，分析十六世紀蘇格蘭古史知識發展的特色，同時也沿用科學知識史中，從社群出發的研究模式，先梳理十六世紀古史辯論參與者所置身的學術社群與知識網絡，再進入特定議題的辯論中。我們將會發現，參與古史辯的學者雖各有國族認同，但也都是當時歐洲「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一份子，²²享有相近的知識傳統、技術、研究課題及人際網絡。他們之間不僅有古史的對決和競爭，也有史學的合作與連結，包括類似的知識架構、書寫形式，以及對知識可信性或真實性的渴求。此外，國族認同並未截斷雙方知識份子的往來，更未全然劃分彼此對待古史的學術立場。十六世紀蘇格蘭學者中固然有捍衛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國族派」(Scottish Nationalists)，如布坎南；卻也有願意與英格蘭學者合作的「不列顛統一派」(British Unionists)，如麥爾(John Mair [or Major], c. 1467–1550)。即便是身為國族派的布坎南，與英格蘭學者間也有密切的書信往來，且獲得他們高

to Cooperate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23), 12–20.

²² “Republic of Letters” 如同近現代的科學社群(the scientific community)，是一「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其拉丁文為 *res publica literaria*，源自十五世紀初義大利人文學者圈，至十六世紀此詞日益普遍，指以全歐人文學者為主體的非正式學術圈。此學術圈以拉丁文為共同的語言，學者間的交流與往來則主要靠信件流通(epistolary communication)，也可謂為「書信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相關研究見 David Rundle, “Humanism across Europe: The Structure of Contacts,” in *Humanism in Fifteenth-Century Europe*, ed. David Rundle (Oxford: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ediev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2012), 307–335; Marc Fumaroli,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Lara Vergnau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度的尊敬與稱讚。²³但在目前研究中，這些知識交流及正向互動的層面，因多從國族對立的角度出發而被忽略，以至於無法真確地瞭解蘇格蘭古史書寫的發展。

本文以下將以蘇格蘭古史為主體，探討它如何在與英格蘭古史書寫的對立與交流中，發展出相應的特色。第二節「辯論的網絡」，說明十六世紀蘇格蘭史家所置身的知識社群及辯論場域，並以「信古派」和「疑古派」簡要區分對待古史傳說兩種不同的立場。第三節「語言與文獻」，聚焦於古史辯參與者共享的學術傳統，以及彼此有關語言及文獻的爭議，特別是「古典語派」(Classicists)和「本土語派」(Vernacularists)之對立，藉此理解他們建立知識可信性的技術或手段。第四節「島名與島民」則處理古史辯中兩項關鍵議題，有關島嶼名稱的由來及主要族群遷徙之先後，兩者皆牽涉了英蘇的政治地位，也能凸顯知識與國家政治權力的緊密連結。

本文雖以古史辯為題，但並不是一篇考據文章，重點不在於判定誰所寫的古史更接近真實歷史，而是探究書寫者在何種知識脈絡中、透過何種方式讓古史展現「過去的力量」(power of the past)。²⁴或用傅科式(Foucauldian)的說法，本篇論文不是為了檢核他們所建立的「真實」(truth)，而是在這場「為真實而戰」(a battle for truth)的對決中，²⁵理解國族利益與

²³ 「蘇格蘭國族派」與「不列顛統一派」之分，見 Mason, “Scotching the Brut,” 64–70. 支持布坎南的英格蘭學者，參見 James E. Phillips,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Sidney Circl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12:1 (November 1948): 23–55.

²⁴ 此詞借用自 Edward J. Cowan and Richard J. Finlay, eds., *Scottish History: The Power of the Pa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的書名。

²⁵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trans.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 Mepham, and Kate Sop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132.

權力如何交織在他們的古史論述中。再者，我們觀察這些史家的書寫行動，不是為了得知他們揭露多少歷史真實面，而是為了省思古史可以如何被發明及重構，以及古史所蘊含的現時性或未來性。古史的研究和書寫，時常如格瑞蘭諾(Stefanos Geroulanos)在《史前史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Prehistory*, 2024)一書中所言：「人類起源的故事從來都不是真的與過去相關……，而是關乎今日。」²⁶十六世紀蘇格蘭史家雖以追求事實為名，所在乎者亦是現時此刻。

二、辯論的網絡

要談知識辯論如何推進知識的發展或形塑其樣貌，必須先界定這場辯論的性質、運作的地域和社群、各學者基本的知識立場，以及他們在這場辯論中所處的相對位置。首先，本文將此知識辯論稱為「不列顛古史辯」，²⁷指有關不列顛古代歷史與民族源流的辯論，特別是西元 43 年羅馬人征服不列顛之前的古代史。由於這段時期文獻記載不多，或有殘缺，或與神話傳說交雜，難以判定真假。即便十二世紀

²⁶ Stefanos Geroulanos, *The Invention of Prehistory: Empire, Violence, and Our Obsession with Human Origins*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24), 6. 此書聚焦於十八世紀至今歐洲人對史前史的探索。作者指出，所有的史前史都非純然的科學或理性探索；這些行動雖然常以追求事實為名，但闡明的其實是特定族群自身的合法性及對他者使用暴力的正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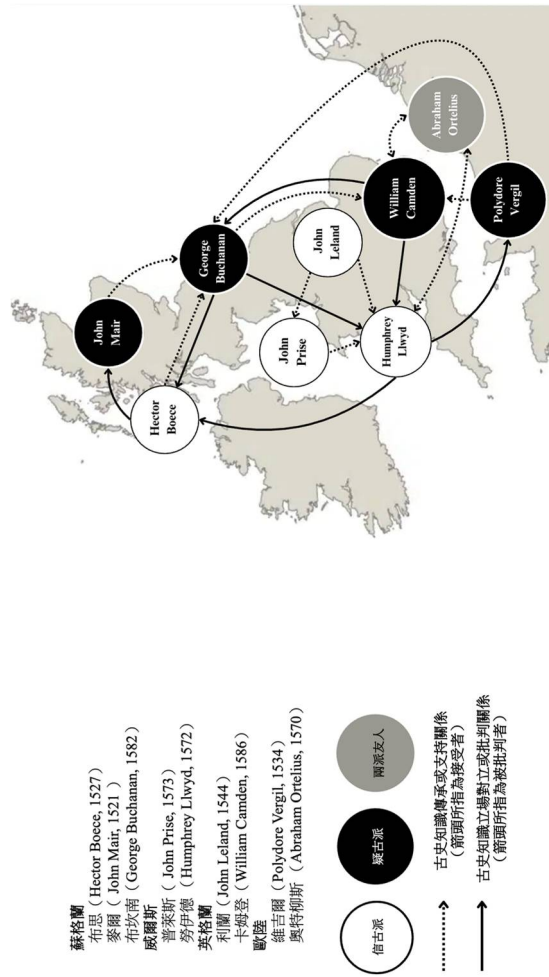
²⁷ 此詞借用二十世紀初葉中國史學上的「古史辨運動」。雖然十六世紀「不列顛古史辯」在年代及區域上與其差異甚大，但在知識發展上頗有相似之處，亦可區隔「疑古」與「信古」兩派，因此借用「古史辨」一詞。不過，本文的焦點在「辯論」，而非辨析或辨偽，故稱「古史辯」。有關中國的古史辨運動，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1987)，236-237；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64-65。

時已有人質疑傑弗瑞《不列顛諸王史》的真實性，如編年史家紐堡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 1136–1198)，稱此作為「虛浮而無恥的謊言」，²⁸但這些批評多屬於單點或零星式的攻擊，直到十六世紀才出現特意捍衛或否定《不列顛諸王史》的歷史作品。²⁹同時，十六世紀的古史辯，如同都鐸王朝擴張的腳步，將威爾斯、英格蘭、蘇格蘭的知識份子交織為一史學論戰的網絡，甚至將歐陸知識分子也涵蓋其內(參見圖 1)；辯論的知識深度與廣度都超越從前。

²⁸ 威廉的質疑，見 Michael A. Faetra, ed. and trans., “Appendix D: Early Responses to Geoffrey of Monmou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289–290.

²⁹ 肯德里克(T. D. Kendrick, 1895–1979)在 1950 年出版的《不列顛的古代》(*British Antiquity*)，是少數以《不列顛諸王史》一書為主角，專門談英格蘭境內與其相關的古史爭議。他將十六世紀時擁護或批評傑弗瑞作品的學者區分為二：中古派(the medievalist)或基本教義派(the fundamentalist)、「現代派」(the modernist)或經驗主義派(the experimentalist)，同時將當時的爭議稱為「不列顛史戰爭」(The Battle over the British History)。此詞也被後來的英格蘭史學研究者所沿用。見 T. D. Kendrick, *British Antiquity* (London: Methuen, 1950), 7, 78–98, 99–104; F. J. Levy, *Tudor Histor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68.

圖1 十六世紀不列顛古史辯參與者之地理網路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並由葉宇軒先生協助繪製，在此深致謝忱。

說明：圖中左側各作者英文名之後所附的年代，為主要作品出版年；各作者在地圖上僅標示出生區域，非明確出生地。

承上，就地域與社群而言，十六世紀不列顛古史辯有明顯的跨國性，最鮮明的例子是勞伊德(Humphrey Llwyd [or Lhuyd] 1527–1568)的《不列顛簡評》(*Commentarioli Britannicae descriptionis fragmentum*, 1572)。³⁰勞伊德出生於威爾斯的登比(Denbigh)，於牛津大學完成學位，並成為著名的古文物學者(antiquary)及地圖繪製者。他長年居住於家鄉且獲阿倫德爾伯爵(Henry Fitzalan, Earl of Arundel, 1512–1580)重用，曾於 1566 至 1567 年間伴隨伯爵前往歐陸旅行，因此結識了安特衛普(Antwerp)的地理學家及地圖繪製者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勞伊德的《不列顛簡評》最初即是應奧特柳斯之邀，於 1568 年以拉丁文寫成。此文簡述不列顛歷史、地理，並附上親手繪製的威爾斯及英格蘭地圖，以增補奧特柳斯正籌劃出版的《寰宇地圖全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570)。這兩人之間的合作，讓奧特柳斯取得不列顛地理與歷史知識，也讓勞伊德與歐洲知識界及當時做為地圖及地理資訊出版重鎮的尼德蘭地區，建立連結。

學術連結的另一面是對抗。勞伊德在《不列顛簡評》中主要批評的對象，一為義大利人文學者維吉爾(Polydore Vergil, c. 1470–1555)、一為蘇格蘭人文學者布思，因為他們傷害了他所捍衛的「甜蜜家園」——威爾斯，以及以威爾斯為代表的不列顛古史。勞伊德認為，威爾斯人是古代布立吞人真正的後裔，且保留了勇武的氣質和最古老的語言(即威爾斯語)。³¹然而：

³⁰ Humphrey Llwyd, *Commentarioli Britannicae descriptionis fragmentum* (Cologne, 1572). 此書出版後，隔年即譯為英文：Humphrey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as This Most Noble, and Renowmed Iland, Was of Auncient Time Deuided into Three Kingdomes, England, Scotlnad and Wales*, trans. Thomas Twyne (London: By Richard Iohnes, 1573).

³¹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B6v, H2r. 勞伊德在另一部作品《威爾斯編年史》(*Cronica Walliae*, c. 1559)中，指出威爾斯完整保留了古代布立吞人的語言超過 2690 年。Humphrey Llwyd, *Cronica Walliae*, ed. Ieuan M.

在義大利人波利多爾·維吉爾(Polydorus Virgilius)和蘇格蘭人赫克特·布思(Hector Boethius)的不列顛史中，前者不但執意削減不列顛名號的光榮，也用毀謗的謊言讓布立吞人蒙羞。後者為了要將他的斯科特人從晦暗不明中高舉而出，凡是見到羅馬人或不列顛人有什麼對此島嶼有益的功績，他全都歸於他的斯科特人，像個愚蠢的作家。³²

勞伊德對這兩人的厭惡，原因不同。維吉爾之惡在於他否定特洛伊起源之說，也不承認亞瑟的功業，並批評古代布立吞人膽小怯懦。布思雖然接受特洛伊神話，但他將不列顛島內英勇抵抗羅馬人及薩克森人的事蹟，都歸於北方斯科特人的成就；他不接受亞瑟曾征服蘇格蘭之說，亦否認布立吞人擁有對蘇格蘭的統治權。這兩人的立場分別表達於他們所寫的《英格蘭史》(*Anglica Historia*, 1534)及《蘇格蘭人史》中。兩書出版地都在歐陸，一為巴塞爾，一為巴黎，兩地都是全歐學術重鎮。維吉爾的作品出版時獻給英王亨利八世，布思的則獻給蘇王詹姆士五世(James V, 1513–1542 在位)，且在國王支持下由貝倫登(John Bellenden, fl. 1533–1587)改寫為蘇格蘭文出版，取名為《蘇格蘭歷史與年鑑》(*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c. 1540)。³³勞伊德寫《不列顛簡評》之時，這兩部

Williams and J. Beverley Smith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6), 64. 勞伊德可謂十六世紀發揚威爾斯國族認同的代表人物，參見 Philip Schwyzer, “‘Awake, Lovely Wale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76–96.

³²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sig. B6r–v.

³³ 兩書的現代版本見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from an Early Translation Preserved among the MSS. of the Old Royal Library in the British Museum*, ed. Sir Henry Elli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Camden Society, 1864); Hector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trans. John Bellenden, 2 vols. (Edinburgh: Reprinted for W. and C. Tait, 1821). 維吉

作品在不列顛或歐洲知識界，都受到相當多關注，尤其是維吉爾的《英格蘭史》，讓勞伊德氣憤地說：「他的書，人手一本，到處都有。」³⁴勞伊德對這兩人的批判與怨氣，充斥於《不列顛簡評》全書，同時將不列顛古史帶入跨國性的辯論中，觸及威爾斯、英格蘭、蘇格蘭三地古史，也牽連不列顛內部及歐陸的學者。

十六世紀不列顛古史辯的起始及其地理跨越性，其實可溯源至 1530 年代，爭端源於維吉爾的《英格蘭史》。維吉爾出生於義大利烏爾比諾(Urbino)，1502 年隨著為教宗收稅的樞機主教卡斯提利(Adriano Castelli, 1460–1521)到達英格蘭，並獲得亨利七世(Henry VII, 1485–1509 在位)的禮遇與重用。當時他已是著名的義大利人文學者與古文物研究者，而甫建新朝的亨利七世正需要一位居於歐洲學術核心，且作品能被歐洲知識份子廣泛閱讀的文人，為他撰寫一部英格蘭史，以宣揚與鞏固都鐸王朝在歐洲的地位。維吉爾接下此任務，但直到 1513 年亨利八世統治期間，才寫就《英格蘭史》初稿，而後幾經修改於 1534 年付梓。³⁵這一年，正是亨利八世政府頒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高舉王權高於教宗權，並強調英格蘭為一「帝國」之時。維吉爾《英格蘭史》的內容正好支持了都鐸王朝的正當性及英帝國的獨立性，因此得到官方的認可。³⁶

爾的作品首版出版之後，至十六世紀結束，又再版五次；布思作品的拉丁文版則在十六世紀再版兩次，至十七世紀也再版至少四次。

³⁴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M4r.

³⁵ 此書於 1513 年已完成，卻延宕至 1534 年才出版，部分學者認為可能與維吉爾否定亞瑟王之真實性有關。見 Stewart Mottram, "Reading the Rhetoric of Nationhood in Two Reformation Pamphlets by Richard Morison and Nichola Bodrugan," *Renaissance Studies* 19:4 (September 2005): 537.

³⁶ James P. Carley, "Arthur and the Antiquaries," in *The Arthur of Medieval Latin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Arthurian Legend in*

然而，在國王欣然接受此書之時，王國境內的本土學者卻對維吉爾及其作品，展開嚴厲的抨擊。³⁷例如，英格蘭古文物學者利蘭(John Leland, c. 1503–1552)，他在 1533 至 1534 年間獲得國王資助，奔波於國內各修道院圖書館，搜尋書籍與檔案，也得到好友貝爾(John Bale, 1495–1563)協助，整理資料及編纂書目，讓許多重要文獻在宗教改革及修院解散的政策下得以保存。³⁸從 1530 至 1540 年代，利蘭不僅為此耗竭心力，也充分利用他所搜尋到的古籍和古物，完成《不列顛最英明之君亞瑟的真實性》(*Assertio inclytissimi Arturij Regis Britanniae*, 1544)一書，反駁維吉爾的說法。³⁹再者，威爾斯人普萊斯(Sir John Prise, 1501–1555)在宗教改革後得到

Medieval Latin, ed. Siân Echard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1), 153–154.

- ³⁷ 十六世紀英格蘭境內的不列顛古史辯，正是因維吉爾的《英格蘭史》而開啟。肯德里克也將此辯論或爭議稱為「古文物學之爭」(the antiquarian controversy)，參與者以威爾斯及英格蘭學者為主，主要爭議內容為布魯特斯及亞瑟王傳說之真實性。不過，歷任都鐸君主似乎未在乎傳說的真實性，官方也未曾譴責維吉爾。另外，也有少數英格蘭學者願意接受維吉爾的說法，如拉斯特爾(John Rastell, c. 1475–1536)及泰恩(John Twyne of Canterbury, c. 1505–1581)等。Kendrick, *British Antiquity*, 85, 42–43, 106–107.
- ³⁸ 貝爾與利蘭關係密切，利蘭過世後，貝爾將他於 1546 年呈給國王的「新年禮物」(a new year's gift，內容為利蘭走訪各地、搜羅古籍的文字報告)，整理並註解後出版：John Bale, *The Laboryouse Journey [and] Serche of Iohan Leylande, for Englandes Antiquitees Geuen of Hym as a Newe Years Gyfte to Kyng Henry the Viiij* (London: Printed S. Mierdman, 1549)。兩人之合作見 C. Brett, “John Leland, Wales, and Early British History,” *Welsh History Review* 15 (1990): 169–182; Cathy Shrank, “John Leland and ‘the Bowels of Antiquity’,” in *Writing the Nation in Reformation England, 1530–15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5–103.
- ³⁹ John Leland, *Assertio inclytissimi Arturij Regis Britanniae* (London: Printed by R. Wolfe, 1544)。這是利蘭一生唯一出版的作品，於 1582 年譯為英文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of the Original, Life, Actes, and Death of the Most*

主政大臣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 c. 1485–1540)的支持，也於各地修道院搜羅古籍並編纂目錄。他曾集結多部威爾斯文所寫成的宗教典籍，於1546年出版《在此書》(*Yny llyvyr hwnn*)，成為目前所知第一本印刷出版的威爾斯文書籍。隔年他又完成《捍衛不列顛史》(*Historiae Brytannicae defensio*)，書中傳達的立場與知識理念皆與利蘭相近。⁴⁰雖然此作至1573年才正式出版，但同為威爾斯人的勞伊德，對普萊斯及利蘭的作品皆為熟悉，他在《不列顛簡評》也明確提及兩人的觀點，讓普萊斯及利蘭成為他的先行者與知識權威。

從利蘭、貝爾、普萊斯到勞伊德，我們可看到1530至1560年代，威爾斯暨英格蘭文人形成捍衛傳統不列顛古史的知識陣營，反制歐陸學者維吉爾所寫的《英格蘭史》。勞伊德戰線的另一端，則是以布思為代表的蘇格蘭史。事實上蘇格蘭內部的古史辯比英格蘭更早開始，起於1520年代蘇格蘭史家麥爾和布思的對立。布思出生於丹地(Dundee)，是十六世紀初期蘇格蘭最著名的人文學者，曾於1485年前往巴黎大學求學。當時的巴黎是人文主義與神學研究的重鎮，也是英格蘭、蘇格蘭及歐陸眾多學子匯聚之處，布思因此得以結識各地傑出的學者，如來自尼德蘭的伊拉斯摩斯(Desiderius Erasmus, c. 1466–1536)、法國人文學者

Noble, Valiant, and Renowned Prince Arthure, trans. Richard Robinson (London: Printed by Iohn Wolfe, 1582). 此作品可能對1540年代亨利八世宣揚英格蘭對蘇格蘭的宗主權極有助益，見 James P. Carley, “Polydore Vergil and John Leland on King Arthur: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Interpretations* 15:2 (Spring 1984): 86–100; Carley, “Arthur and the Antiquaries,” 159–162.

⁴⁰ 有關《在此書》，參見 R. Geraint Gruffydd, “*Yny llyvyr hwnn* (1546): The Earliest Welsh Printed Book,” *The Bulletin of the Board of Celtic Studies* 22, part 2 (May 1969): 105–116. 《捍衛不列顛史》的現代版本見 John Prise, *Historiae Brytannicae Defensio. A Defence of the British History*, ed. and trans. Ceri Davies (Oxford: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加昆(Robert Gaquin, 1433–1501)，以及同樣來自蘇格蘭低地區的士林哲學家麥爾。麥爾和布思兩人在 1520 年代各寫了一部歷史作品，麥爾的《大不列顛史：英格蘭與蘇格蘭》(*Historia majoris Britanniae tam Angliae quam Scotiae*) 於 1521 年出版，比布思的《蘇格蘭人史》早 6 年，但兩者都由同一位巴黎出版商(阿森西斯[Jodocus Badius Ascensius, 1462–1535])出版，且都獻給蘇王詹姆士五世。⁴¹

不過，麥爾的作品並未受到國王青睞，或許與他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麥爾以 1503 年蘇王詹姆士四世(James IV, 1488–1513 在位)與英王亨利七世之女瑪格麗特(Margaret Tudor, 1489–1541)的聯姻為基礎，主張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同在一島，「皆是不列顛人」，雙方應當擺脫荒誕無稽的布魯特斯或斯科塔神話，以相近的血緣、語言及風俗平等地統合為一國。⁴²此種想法是當時蘇格蘭政治中的少數派，也與國王堅持蘇格蘭獨立、與法國維持「老同盟」(auld alliance)的態度大相逕庭。布思的《蘇格蘭人史》可視為對麥爾的反擊，揭開了十六世紀蘇格蘭古史辯的序幕，

41 麥爾於 1494 年取得巴黎大學碩士學位，但他在前往巴黎求學前，先於 1491 年左右至英格蘭劍橋大學就讀，且與亨利八世的大臣烏爾西(Thomas Wolsey, c. 1473–1530)關係友好。麥爾的《大不列顛史》在十六世紀並未再版，直到 1740 年才於蘇格蘭愛丁堡再版。參見 Alexander Broadie, *The Circle of John Mair: Logic and Logicians in Pre-Reformation Scot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大不列顛史》的現代版本見 John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as well England as Scotland. Completed from the Ancient Authorities by John Major*, trans. Archibald Constable (Edinburgh: Printe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892)。

42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18, 51–52. 麥爾對英蘇統一的想法，參見 Roger A. Mason, “Kingship, Nobility and Anglo-Scottish Union: John Mair’s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1521),” *The Innes Review* 41:2 (Autumn 1990): 182–222.

同時這也是一場內部的統獨之爭及外交路線之爭(親英或親法)，⁴³清楚呈現了歷史知識與政治問題的交纏。

相對於麥爾的疑古，布思傳承十四世紀編年史家約翰的策略，一方面接受傑弗瑞所提出的特洛伊傳說，承認布魯特斯建立了布立吞人的王國；但另一方面，他主張布魯特斯的國度從未及於蘇格蘭，僅在羅馬人所建的「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以南。⁴⁴換言之，蘇格蘭地區當時便自成一格，有自己的祖先，即來自希臘王室的蓋提祿斯及埃及法老之女斯科塔；前者屬擊潰特洛伊人的民族，後者與《聖經》及以色列歷史有密切的連結，兩者結合的血統比特洛伊的布魯特斯更為高貴。布思追隨約翰挪用英格蘭古史建構的手法，讓斯科特人自成體系，接著再指斯科塔的后裔於西元前 330 年，在佛格斯一世(Fergus I or Fergus McFerchard, 330–305 BCE 在位)帶領下，從愛爾蘭移入蘇格蘭西部達爾里阿達，建立王國。此王國從佛格斯一脈傳承而下，至西元 370 年代，因皮克特人的入侵而流亡 45 年，後於西元 422 年由佛格斯二世(Fergus II, or Fergus Mór mac Erc, 422–438 在位)率領族人重回故土，復興王國。古代蘇格蘭王國，從佛格斯一世至佛格斯二世共歷 40 位君主(共 750 餘年)，此後王位

⁴³ 麥爾的《大不列顛史》為親英派發聲。當時蘇格蘭的親英派由安格斯伯爵(Archibald Douglas, 6th Earl of Angus, c. 1489–1557)領導，他於 1514 年娶詹姆士四世遺孀瑪格麗特，並主導政府運作，主張與英格蘭建立同盟關係。此情勢引發親法派的不滿並開啟內戰。親法派領導者為奧爾巴尼公爵(John Stewart, 2nd Duke of Albany, 1482–1536)及亞倫伯爵(James Hamilton, 1st Earl of Arran, c. 1475–1529)，雙方的衝突延續至 1529 年，最終親英派戰敗，安格斯伯爵流亡到英格蘭。參見 Rosalind Mitchison, *A History of Scotland* (3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89–94.

⁴⁴ 哈德良長城建於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 117–138 在位)治下的西元 122 年，東起泰恩河，西至索爾韋灣(Solway Firth)。至西元三世紀初，此長城已多有破損，後由羅馬皇帝塞維魯斯(Septimius Severus, 193–211 在位)整修。

一脈相承，未曾被任何外族所統治，至肯尼斯(Kenneth MacAlpin, 848–858 在位)統治時期，兼併皮克特人的王國，統治蘇格蘭全境。⁴⁵

布思的古史建構策略，就是麥爾在《大不列顛史》中所抨擊的：
對這個出自希臘和埃及的起源，我認為只是個故事(a fable)，理由是：他們的英格蘭敵人先學會了誇耀自己的起源來自特洛伊，蘇格蘭人就宣稱擊敗特洛伊的希臘人是他們的先祖，接著再用更有名的埃及王國來美化自己……[他們]把所有半真半假的說法混雜在一起。能夠確認的只有愛爾蘭人源自西班牙人，而蘇格蘭的布立吞人源自愛爾蘭人。⁴⁶

麥爾嘗試區隔真正的「歷史」和傳說的「故事」，他的批評正說明蘇格蘭的古史書寫，長期以來是在與英格蘭古史互動及競爭的脈絡中成形。另值得一提的是，引發英格蘭內部古史辯的維吉爾，於 1521 年在倫敦結識蘇格蘭詩人道格拉斯(Gavin Douglas, c. 1476–1522)，並因此得知麥爾的作品及其對起源傳說的批判。雖然維吉爾委婉地表示，他對另一個國家如何利用神祇或英雄人物建立起源傳說，無權置喙；但他也

⁴⁵ 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41–42, 67–68, 77–79, 136–138;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vol. 1, 3–6, 15–16, 243, 256–258; vol. 2, 150–154. 布思對於年代的斷定與十四世紀的約翰略有出入。約翰認為蘇格蘭人流亡的年份是西元 360 年，布思卻主張在 379 年；約翰主張佛格斯二世復國的年份是 403 年，布思則說在 422 年。他們的年份記載或總數計算，在各自的作品內也未必前後相符。此外，布思主張從佛格斯一世至佛格斯二世共歷 40 位君主，但約翰主張有 45 位；與布思同時期的麥爾則主張只有 15 位君主，共統治 700 年。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79;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64.

⁴⁶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51–52. 麥爾主張不列顛最早只有一個王國，所有住民都是布立吞人，所以在此段落刻意將蘇格蘭人稱為「蘇格蘭的布立吞人」。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17.

呼應麥爾的立場，主張史家應當「無畏於發掘虛假」，不讓「真實」蒙塵。⁴⁷這也正是維吉爾對英格蘭古史的態度，因此他批評十二世紀的傑弗瑞自行編纂無人寫過的「新歷史」(newe historie)，恰是一齣「偽造的把戲」(feined trifls)。⁴⁸維吉爾與麥爾兩人對於上古傳說同樣採取懷疑的態度，他們之間的相知也是英蘇古史辯交會的另一案例。此案例亦顯示，從 1520 年代開始，不列顛古史辯跨越的學術社群，就已涵蓋歐陸、英格蘭、蘇格蘭等地，只是學者間的互動和對話的密集性不如 1560 年代之後。

再回到布思。除了對起源神話的態度不同之外，他的歷史寫作方式亦與麥爾大相逕庭。麥爾長於批判、分析和說理，⁴⁹布斯則沿襲古羅馬作家李維(Livy, 59 BCE-17)、塔西陀(Tacitus, c. 56-c. 120)的筆調，以流暢的拉丁文，為古代君主之生平及行誼留下生動的敘述，並為他們在各類場合(如開戰前、議會中)編寫演說辭，使其作品之可讀性遠勝於先前的編年史著作，也發揮文藝復興時代歷史作品重要的教化功能，並做為君主統治的借鏡。⁵⁰布思的歷代君王敘述最突出之處，也是最有爭議

47 維吉爾在《英格蘭史》中簡述蘇格蘭人的起源，並提到相關資料得自蘇格蘭人文學者道格拉斯的幫助，而後者也是麥爾多年的密友。道格拉斯與麥爾兩人皆與英方親善，只是道格拉斯並不贊同麥爾對蘇格蘭起源傳說的批判。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105-106, 107. 道格拉斯也曾參與親英派的行動，他的姪子就是此派領導者安格斯伯爵(見註 43)。道格拉斯的交友網絡，見 Priscilla Bawcutt, "The Correspondence of Gavin Douglas," in *Stewart Style, 1513-1542: Essays on the Court of James V*, ed. Janet Hadley Williams (East Lothian: Tuckwell Press, 1996), 52-61.

48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33.

49 麥爾的學術專長是神學，他指出自己寫作的方式較接近神學作品的論理方式，而非歷史的敘述方式。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cxxxiii.

50 Royan and Broun, "Versions of Scottish Nationhood," 179. 布思對古代作家的傳承，見 John Mark Philo, "Tacitus, Hector Boece, and the Writing of Scottish

之處，在於他詳列從佛格斯一世至佛格斯二世共 40 位君主的名號、在位年，並說明他們的統治優劣。然而，先前的編年史家約翰卻從未提及任何詳細的內容。⁵¹那麼，布思的材料從何而來？布思在《蘇格蘭人史》中指出，他主要參考十三世紀聖安德魯(St. Andrews)教堂的副主教費瑞蒙(Veremund, fl. 1239–1268)所寫之古代史，並靠著坎貝爾爵士(Sir John Campbell, d. 1562)從西岸小島愛奧尼亞(Iona)帶到蘇格蘭本土。⁵²問題是，此材料過去從未出現於相關記載中，沒有其他人見過，因此真實性頗受質疑，也更讓人相信他建構古史的手法，與傑弗瑞如出一轍。⁵³

不論這些材料是否由布思所偽造，不可否認的是，布思的影響力遠超過揚棄神話的麥爾，成為日後英蘇史家書寫蘇格蘭史時，主要的素材來源。⁵⁴在後繼的史家中，最具開創性與影響力的是布坎南。他

History,” *Scottish Literary Review* 12:2 (Autumn/Winter 2020): 111–136.

51 在這 40 位君主中，約翰僅列出佛格斯一世、羅達(Reuda)、尤金紐斯(Eugenius)及佛格斯二世等四位君主的姓名，其他付之厥如，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完整的資料」。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79. 依據現代史學研究，在這 40 位君主統治的時代，蘇格蘭人還未從愛爾蘭移居蘇格蘭。Nicola Royan, “Hector Boece and the Question of Veremund,” *The Innes Review* 52:1 (Spring 2001): 53.

52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vol. 1, 53, 254.

53 傑弗瑞宣稱，牛津副主教瓦爾特(Walter of Oxford, d. 1151)從威爾斯得到一本「古書」(*vetustissimus liber*)，是以古代布立吞人的語言寫成(即當時的威爾斯語)，並請他翻譯為拉丁文，其成品即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但這本古書從未被其他史家提及，也無人見過。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41, 197, 217. 布思所依賴的材料也是如此，雖然學者羅恩(Nicola Royan)主張，費瑞蒙所寫的歷史並非由布思所偽造，但也無法明確指出這些材料究竟從何而來，或內容是否為真。Royan, “Hector Boece and the Question of Veremund,” 53–60.

54 除了布坎南之外，蘇格蘭史家萊斯里(John Leslie, Bishop of Ross, 1527–1596)也大幅參考布思之作，於 1578 年出版《蘇格蘭人的起源、風俗與事蹟》(*De origine, moribus, et rebus gestis Scotorum libri decem* [Romae: In

出生於蘇格蘭高地區的基爾納(Killearn)，1525年時在聖安德魯斯(St Andrews)大學完成學位，期間受教於麥爾，並跟隨他前往巴黎繼續求學，成為巴黎人文學者圈中的一份子。布坎南於1536年回到蘇格蘭，這一年正是布思過世之年，布坎南也取代他成為全歐最知名的蘇格蘭人文學者。從1536年至1560年，布坎南頻繁往來於蘇格蘭及歐陸各地，1561年之後才長居母國，並得到瑪麗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 1542–1567在位的)禮遇。在1567年蘇格蘭宗教改革運動風潮中，布坎南最終選擇站在新教陣營，批判瑪麗女王，並支持其子詹姆士六世(James VI, 1566–1625在位)繼位。⁵⁵後來他成為國王的古典學教師，其《蘇格蘭史》也獻予國王。⁵⁶

aedibus populi Romani, 1578])，並將其獻給蘇格蘭瑪麗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 1542–1567在位)。與布坎南不同，萊斯里堅守天主教信仰並捍衛瑪麗女王統治的正當性。十六世紀英格蘭歷史寫作中，借用布思作品最有名的是霍林斯德(Raphael Holinshed, c. 1525–c. 1580)編纂的《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編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577, 1587)，見 Raphael Holinshed,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Chronicles*. 1586. First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Raphael Holinshed, William Harrison et al. Reprinted with manifold matters of singular note and worthie memorie by John Hooker alias Vowell Gent et al. (London: Printed by Henry Denham, 1587)。但此書仍採取當時英格蘭的主流觀點，伸張英對蘇的統治權。

⁵⁵ 布坎南此後成為詆毀瑪麗女王最力的蘇格蘭作家，曾寫《審判蘇格蘭瑪麗女王》(*De Maria Reginae Scotorum*, 1571)、《論蘇格蘭王權的規範》(*De iure regni apud Scotos*, 1579)等作。有關布坎南之研究，見 William Ferguson, “George Buchanan, Humanist and Historian,” in *The Identity of the Scottish Nation*, 79–97; Philip Ford and Roger P. H. Green, eds., *George Buchanan: Poet and Dramatist* (Swansea: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9); Caroline Erskine and Roger A. Mason, eds., *George Buchanan: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Europe* (Farnham: Ashgate, 2012)。

⁵⁶ 獻詞見：George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trans. James Aikman (Glasgow: Blackie, Fullarton & Co., 1827), vol. 1, ciii–

布坎南的作品，一方面大量採用布思有關上古君王的敘述，接收佛格斯一世至佛格斯二世 40 位君王世系，以鞏固蘇格蘭王國的古老性和獨立性；但另一方面，他否定斯科塔傳說，僅以佛格斯一世為蘇格蘭王國歷史的開端，而且強調自其以來蘇格蘭人民便有選舉權及裁罰暴君的權利，為有限王權及「古憲法」(ancient constitution)提供明確的歷史證據。⁵⁷布坎南對待蘇格蘭古史的態度較偏向麥爾，對起源傳說的否定也接近為英格蘭著史的維吉爾，⁵⁸但他的批判力道及幅度更大。在他寫給英格蘭友人、駐蘇格蘭使節蘭道夫(Thomas Randolph, 1523–1590)的信件中，他說自己不僅要矯正「蘇格蘭人的虛華」(Scottis vanite)，也要駁斥「英格蘭的謊言」(Inglisthis)。⁵⁹他的作品，如同勞伊德的《不列顛簡評》，要打的是一場跨國辯論賽，既批評布思的錯誤，更嚴厲抨擊勞

civ. 不過布坎南的政治立場，如有限君權及人民反抗權，與主張君權神授的詹姆士六世有極大差異，兩人的關係及理念之異，見 Roger Mason, “*Rex Stoicus: George Buchanan, James VI and the Scottish Polit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Early Modern Scotland*, ed. John Dwyer, Roger A. Mason and Alexander Murdoch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82), 9–33.

⁵⁷ 布坎南的古憲法主張，參見 H. R. Trevor-Roper,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Ancient Scottish Constitution* (London: Longmans, 1966); J. H. Burns, *The True Law of Kingship: Concepts of Monarchy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191–209.

⁵⁸ 布坎南在作品中數次提到維吉爾，對其主張有贊成也有批評。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02, 233–234.

⁵⁹ George Buchanan, *Vernacular Writings of George Buchanan*, ed. P. Hume Brown (Edinburgh and London: Printed by the Scottish Text Society by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92), 58. 從他們的通信中，可知布坎南於 1576 年左右已在著手寫作《蘇格蘭史》，且與英格蘭知識分子分享對勞伊德的不滿。Phillips,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Sidney Circle,” 49–50.

伊德是「厚顏無恥或愚蠢不堪」的史家。⁶⁰

布坎南與英格蘭古史書寫的互動，使他的作品不僅串連起 1530 年代至 1570 年代英蘇的古史辯，也將這場跨國古史辯延續到 1580 年代，甚至進入十七世紀。他的立場與古史研究方法影響了英格蘭古文物學者卡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其於 1586 年出版的《不列塔尼亞》(*Britannia*)，是十六世紀不列顛古代歷史及地理敘述集大成者，且此作於十七世紀大幅擴增又多次再版。⁶¹卡姆登在作品中引用布坎南的看法，也批評勞伊德，而且他與布坎南對古羅馬文明及拉丁文的尊崇，態度一致，甚至兩人對建立英蘇古代性的使命感，也有相似的表達。布坎南說他之所以耗費心力寫蘇格蘭史，是「為我們尋回祖先，也為祖先尋回我們」；卡姆登則指出他的努力是「為不列顛尋回古代，也為古代尋回不列顛」。⁶²

⁶⁰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93.

⁶¹ 此書首版為拉丁文：*Britannia siue Florentissimorum regnorum, Angliae, Scotiae, Hiberniae, et insularum adiacentium ex intima antiquitate chorographica description* (Londini: Per Radulphum Newbery, 1586)。1586 年之後，此作陸續於 1587、1590、1594、1600、1607 再版，文字內容日漸擴增，且從 1607 年開始加入多幅地圖；十七至十九世紀，此書仍再版 7 次。參見 Oliver D. Harris, “William Camden, Philemon Holland and the 1610 Translation of *Britannia*,”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95 (2015): 279–303. 此外，《不列塔尼亞》一書於 1610 年在卡姆登監督下，由霍蘭德(Philemon Holland, 1552–1637)譯為英文，在不列顛境內流傳更廣。見 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the Ilands Adioyning, out of the Depth of Antiquitie*, trans. Philémon Holland (London: Printed at Eliot’s Court Press by George Bishop and John Norton, 1610).

⁶²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16; Camden, *Britain*, π4r. 現有的研究多忽略布坎南對卡姆登的影響及相呼應之處，甚至只強調後者對前者的批評，如 Roger A. Mason, “*Certeine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alme of Scotland*,”

也值得一提的是，卡姆登的作品亦是因歐陸地理學家奧特柳斯的鼓勵而開啟。他在〈致讀者〉一節提到，1577年時奧特柳斯訪英，他們得以相識並討論不列顛古代地理及地名起源。在奧特柳斯勸說下，卡姆登致力為歐洲知識界「重續古代、照亮矇昧、釐清疑難，並藉著復原召喚真理回鄉」。⁶³這樣的連結似乎又把我們帶回1567年的勞伊德，同樣因奧特柳斯的激勵而開啟古代歷史與地理書寫；同時也再次呈現不列顛與歐陸學術界的連結。此外，在古史爭議問題上，卡姆登作品中提到多位本國及歐陸人文學者或古文物學者，如英格蘭人文學者艾列特(Sir Thomas Elyot, c. 1496–1546)、利蘭、勞伊德等人；又如義大利人文學者維吉爾、荷蘭人文學者貝卡努斯(Johannes Goropius Becanus, 1519–1573)、法國人文學者布丹(Jean Bodin, c. 1530–1596)等。⁶⁴顯見當時不列顛古史是跨越島嶼和大陸的知識議題。

整體而言，十六世紀不列顛古史辯，起始於1520–1530年代的蘇格蘭史家麥爾及義大利人文學者維吉爾，他們兩人的知識立場相互唱和，是這場辯論中疑古派路線的開創者，主張以懷疑或否定態度面對起源傳說。先是1520年代麥爾的作品引來信古派史家布思的反擊，開啟了蘇格蘭內部的古史辯；接著在1530年代，維吉爾激起英格蘭

George Buchanan and Scottish Self-Fashioning at the Union of the Crowns,”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92:1 (April 2013): 53.

⁶³ Camden, *Britain*, π4r. 奧特柳斯在英格蘭的交友圈，見 Tine Luk Meganck, *Erudite Eyes: Friendship, Art and Erudition in the Network of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Boston: Brill, 2017), 24–27, 108–109.

⁶⁴ Camden, *Britain*, A3r-v. 參與其中的歐陸學者，參見 D. R. Woolf, *The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170–171. 這些歐陸學者中，對卡姆登最具影響力的當屬維吉爾，他是除了布坎南之外，形塑卡姆登古史研究方法另一重要人物，卡姆登在作品中也曾同時提及兩人，見 Camden, *Britain*, A4r.。

學者利蘭、貝爾、普萊斯等人，宣揚並證明特洛伊起源的知識行動，促成英格蘭與威爾斯兩地信古派的聯合陣線。這些或合作或對抗的學者，可說從 1520 年代起就構成了不列顛古史辯的跨國社群，但彼此間知識的交會或取用有限。至 1560–1570 年代，威爾斯史家勞伊德在《不列顛簡評》中，才更明確地將威爾斯、英格蘭及蘇格蘭三地的古史爭議合為一體討論，為古史辯論帶來熾熱的柴火，也開啟英蘇古史知識的轉型。此轉型的歷程，我們必須在古史辯參與者如何運用及檢驗文獻、如何看待何謂真實知識中探索。簡言之，我們須問：他們如何建立古史的「認識論」(epistemology)？

三、語言與文獻

上節所討論的辯論網絡及主要參與者的關係，是我們進入蘇格蘭古史書寫知識史的第一步。以下將繼續從知識傳統、研究方法、書寫方式與內容，探討十六世紀蘇格蘭史家如何回應此辯論，並在行動過程中建立古史的認識論。首先，在古史辯論網絡中，幾乎所有參與者都分享了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理念，以「復古」做為文化「重生」的途徑。此種復古，表現於他們尊崇並依循古代希臘、羅馬所留下的典籍，用以重述或顛覆中古時期的歷史書寫。⁶⁵如羅馬史家塔西陀的《阿格利克拉》(*Agricola*, c.97)，內容為西元一世紀羅馬征服不列顛的歷程，自其於十五世紀被義大利人文學者重新發現並印刷出版後，便成

⁶⁵ 現代史家伯克(Peter Burke)曾整理文藝復興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古代史家，本文提及的李維、塔西陀等人，皆榜上有名，其中塔西陀的重要程度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不斷提升。Peter Burke,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1450–1700," *History and Theory* 5:2 (1966): 135–152.

為布思及維吉爾等史家重要的參考文獻。維吉爾還進一步挖掘不列顛本土存留的拉丁文文獻，蒐集六世紀作家吉爾達(Gildas, c. 500–c. 570)的《不列顛之衰亡與征服》(*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並於 1525 年將親自修訂的版本於安特衛普出版。⁶⁶此書成為第一部印刷出版的古代不列顛作品，也成為維吉爾用以駁斥特洛伊起源的憑據，因為這部比傑弗瑞《不列顛諸王史》更古老的作品中，完全未提到布魯特斯及亞瑟。⁶⁷

古史辯中的復古，也表現於上節提及的利蘭、普萊斯、勞伊德等人，搜羅威爾斯文古籍以重現古代不列顛樣貌。不論是從古希臘、羅馬典籍或本土古語文獻入手，十六世紀古史辯的參與者，都延續了十四世紀義大利人文學者的復古精神及對古代文獻的重視。此外，義大利人文主義運動所衍生的「文獻學」(Philology)及「古文物學」(Antiquarianism)，提供了古史辯參與者研究古史的知識基礎。文獻學萌芽於佩托拉克(Petrarch, 1304–1374)對古羅馬史家李維《羅馬史》(*Ab Urbe Condita*)的版本校對及編纂，十五世紀時又有瓦拉(Lorenzo Valla, c. 1407–1457)對「君士坦丁之捐贈」(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考證，逐步成為一門十六世紀的「新科學」。⁶⁸於是，更多人文學者從歷史演變的角度追索語言和文字的發展，在文獻所屬的時代脈絡中理解其真義，也藉此判定文獻所屬的真實年代。此

⁶⁶ David Schaps, "The Found and Lost Manuscripts of Tacitus' *Agricola*," *Classical Philology* 74:1 (January 1979): 28–42; Joseph M. Levine, *Humanism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49–50.

⁶⁷ 維吉爾盛讚吉爾達是一位「驅逐傳說、熱切擁抱事實」的史家。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27.

⁶⁸ 「新科學」(the new science of philology)一詞出自思想史學者凱利(Donald R. Kelley, 1931–2023)，他在研究中指出文獻學是「語言的科學」，也是「近現代史學的主根」。Donald R. 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Language, Law and History in the French Renaiss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53, 55, 79.

一顯學亦改變了十六世紀歷史知識的面貌，史家一方面以更具批判的態度面對文字史料，另一方面也將「求真」視為歷史知識最高的目標。他們追隨前輩義大利人文學者波利齊亞諾(Angelo Poliziano, 1454–1494)的步伐，區分兩種不同的歷史：虛假的故事(fabularis)及忠實的記載(ad fidem)，只有後者才是回歸史料的客觀事實陳述。⁶⁹前文已提過麥爾及維吉爾對此兩種歷史的分辨，其他延續古史傳說的作家，如利蘭、勞伊德及布思等，其實也同樣宣稱他們的書寫奠基於真實的史料，而且「鄙視故事，尊崇且擁抱歷史事實」。⁷⁰

文獻學之外，十六世紀另一個改變歷史知識的潮流是古文物學，它關切「古代世界所有面向」的知識以及各類事物的「起源」。⁷¹它同樣源自義大利人文學者的啟發，如佩托拉克、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及比翁多(Flavio Biondo, 1388–1463)等人對古羅馬城遺跡的研究；也同樣到十六世紀才盛行於歐洲各地的人文學者間。古文物學與文獻學非常相近，皆重視文獻版本的考證及比對，但相較於文字史料，古文物學者更在乎物質史料，包括歷史發生的地理場景、考古挖掘出現的錢幣、殘留的建築物、街道、城牆、碑文及各樣器物等。在尊崇古典歷史作品的文藝復興時代，古文物學者藉著對地景及實物的研究，擴張了古代史的可能性，並以專題性的方式(如民族源流、河流、服飾、錢幣、法律、宗教、軍隊、政治組織等)，探索從遠古至當代歷史的諸多

⁶⁹ Christopher S. Celenza,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14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1–16, 133–143.

⁷⁰ Leland,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G4r.

⁷¹ Eric Cochrane,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423;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English Antiquaria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5), 9.

面向，使得歷史書寫不再侷限於政治史，或僅為道德教化服務，而有更多接近今日所稱之文化史、環境史、物質文化史的成果。⁷²

古文物學在十六世紀主要的發表形式是「地方志」(chorography)，是一融合地理、地景及歷史的文類，代表性著作如比翁多的《義大利記述》(*Italia Illustrata*, 1474)及塞爾蒂斯(Conrad Celtis, 1459–1508)的《日耳曼記述》(*Germania Illustrata*, 1502)等。⁷³對古文物學者而言，「空間」的重要性更勝於「時間」，環境樣貌應當比歷史事件更優先被考慮，或至少同等重要。義大利人文學者波利齊亞諾在有關歷史書寫的討論中，就指出忠實的歷史需考慮「地方」，如同地理學；也需考慮「時間」，如同編年史。⁷⁴這類理念形塑了十六世紀歷史書寫的新樣貌，可見於古史辯中各個作品。它們都從地理位置、地形與地貌的描述開始，尤其是布坎南和卡姆登，他們對蘇格蘭及不列顛的地理及地景的介紹，較諸前輩的作品更為詳盡。卡姆登的《不列塔尼亞》其實是標準的地方志作品，而非當時一般性的歷史著作，書中收錄大量的地圖、錢幣圖及碑文，這些圖像及物質史料的討論是其他著作所缺乏的。不過，十六世紀歷史書寫中對空間或地景的重視程度，只是相對而言，因為古代及中古時期的歷史作品中，也常見以簡略的地理描述為起始，如塔西陀

⁷² 有關古文物學的發展，見 Roberto 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2nd e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21–32; Stuart Piggott, *Ruins in a Landscape: Essays in Antiquarian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4; Cochrance,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423–444.

⁷³ 這些作品被伯克視為「地理學文藝復興」(geographical Renaissance)的表現。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31.

⁷⁴ 引自 Celenza,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134.

的《阿格利克拉》及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都是如此。

上述文獻學及古文物學兩潮流，雖然都萌芽自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的人文學者，並在十六世紀蓬勃發展，但它們對不列顛學者的影響，並不完全來自義大利，也透過法國學界的引介及與低地地區的交流。法國的文獻學及古文物學由人文學者比代(Guillaume Budé, 1467–1540)奠定基礎，後由布丹繼之，影響了日後至法國訪問或求學的眾多不列顛學子，如布思及布坎南等人。低地區則是以奧特柳斯所建構的地理學及古文物學者合作網絡為主，其中包含數位不列顛學者，如勞伊德及卡姆登等。⁷⁵換言之，不列顛古史辯的參與者，不僅共享文藝復興的學術思潮與實作，也有相互重疊的學術傳承及人際網絡。

除共享知識背景及人際網絡之外，古史辯參與者也有共同關注的古史議題，成為對立兩方爭執的焦點，也形塑了蘇格蘭古史書寫的內容。這些議題可分為三項：第一，文獻問題。哪一類或哪一種語言所記載的資料才是可信的？如何分辨真實的作品和假造的史料？此議題正是文藝復興文獻學最核心的主題。第二，不列顛島名的由來。誰是不列顛島的命名者？源自哪一種語言？島名的原義為何？這些問題牽涉島嶼地理樣貌及最初主宰此島的民族。第三，居住於不列顛的各民族之起源及文明發展。雖然十六世紀英蘇史家都承認不列顛是一多民族聚居之地，但誰先來、誰後到；誰為本、誰為末；誰文明、誰野蠻？這些都是當時古文物學爭論的問題，也是「地方志」書寫中所關注的面向。本節將先討論第一項文獻議題，下一節再談島名和島民的議題，以瞭解十六世紀蘇格蘭史家如何在這些關鍵議題上，建立蘇格蘭國族的「本貌」，並與英格蘭學者一別苗頭。

⁷⁵ 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53–85; Meganck, *Erudite Eyes*, 15–35.

就第一項文獻議題而言，布坎南的《蘇格蘭史》深刻而尖銳地凸顯了十六世紀下半葉疑古派與信古派的分歧。他的作品如同其他同時代的歷史書寫，先從不列顛的地理、地名及各區域風土開始談起(第一卷)，再進入歷史段落。可是，此書的第二卷卻不是直接敘述蘇格蘭祖先的歷史，而是直擊文獻與史料問題；第三卷接續羅列他所參考之主要文獻，並摘錄關鍵內容。這兩卷(或前三卷)成為他參與不列顛古史辯的宣言。⁷⁶他指出，除了古代希臘人或羅馬人零星的記載之外，高盧、西班牙、日耳曼、不列顛等地，根本沒有本土的古代歷史記載，所以：「那些自稱從古老編年史中發掘布立吞人之起源的人，應該告訴我們是誰最早發現這些編年史？它們長久以來被藏於何處？它們如何經歷多個世代依然被完整保留至今？」那些無法清楚說明的人，在他看來只是「故事的發明者」。⁷⁷他批評有些人把吟唱詩人與吟遊歌手(the bards and senachies)視為古代文獻的保存者，真是荒唐至極，因為這群人是文盲，根本不懂得用任何文字紀錄下他們所傳唱或朗誦的內容。他們只會歌功頌德，只在乎能拿到的賞金，而不在乎歷史的真實性。若史家完全依賴他們的「記憶」，那就是不斷地在創造錯誤和堆疊謊言。⁷⁸他所批評的對象正是勞伊德這一類史家。

至於中古時期至當代的歷史書寫是否可用？布坎南指出：那些作家常有自相矛盾之語，而且無法抑制個人民族的自尊心，總是迷戀於創造自身高尚而古老的起源。最鮮明的例子，就是「不列顛的新歷史」(a

⁷⁶ 布坎南其實從第一卷就開始批評勞伊德。英格蘭學者崔佛-羅珀從收藏在愛丁堡大學的《蘇格蘭史》手稿(Edinburgh University Library MS Dc 4. 60)推斷，此書的前三卷可能是單獨完成，主要目的是為了反駁勞伊德，至出版時再與蘇格蘭歷史敘述的手稿合併。Trevor-Roper,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Ancient Scottish Constitution*, 51–53.

⁷⁷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64–65, 70.

⁷⁸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65–67, 128.

new history of Britain)——布魯特斯的傳說。他指責這個傳說的創造者或傳承者，從來沒有搞清楚語言問題。例如，「布魯特斯」本身就是個拉丁文名，怎麼會來自特洛伊呢？究竟布魯特斯及其族人所用的語言是何種？他們聽得懂羅馬神祇用拉丁文所發的神諭，或布立吞先知用不列顛古語所講的預言嗎？種種謬誤，讓布坎南確認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是部偽造的作品。⁷⁹對於假借傳說、抬高民族起源尊貴性一事，蘇格蘭人也不遑多讓。布坎南指出，蘇格蘭作家用打敗特洛伊人的希臘人當祖先，找了一位名為蓋提祿斯的希臘人，頌揚他如何在埃及屢建奇功，取代摩西成為大統帥；離開埃及後又如何無懼風浪，帶著族人環航地中海沿岸，最後落腳西班牙。然而，這個故事的創造者似乎不懂希臘文，未能給予讀者任何希臘文的人名或地名；人們在古代希臘文或拉丁文的著作中，也完全不見任何作家提及蓋提祿斯此人。因此，光從語言問題，以及「所有希臘與拉丁作家的沈默」，就可得知布魯特斯或蓋提祿斯的傳說，都是由中古「黑暗時代」無良又無知的學者所編造的。⁸⁰

既然本土的文字記錄付之厥如，詩人與吟遊者的記憶不可採信，今人的歷史書寫充斥傳說與妄言，布坎南主張唯有希臘文與拉丁文的記載值得參考。他認為即便古典記載中有部分內容來自作者的臆測，這些臆測也比「我們自己的故事」更值得信賴。⁸¹布坎南接著在《蘇格蘭史》第三卷，列出所有他主要參考的材料，從凱薩(Julius Caesar, 100-

⁷⁹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69, 72, 75. 十六世紀史家所說的「新」(new)帶有貶意，維吉爾與布坎南等史家，都以「新歷史」批評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布坎南對此書的批評，見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69-76.

⁸⁰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76-78.

⁸¹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67.

44 BCE)到吉爾達的拉丁文著作共計 10 部。其中除了比德(Bede the Venerable, c. 672–735)和吉爾達兩位古代晚期的不列顛本土作家之外，其他都是古羅馬作家。⁸²布坎南尊奉古典語文作品的立場，與義大利人文學者維吉爾相同，兩人皆可視為古史辯中的古典語派。相對於此，布坎南所批判的勞伊德則可稱為本土語派，雖然他也接受古典作品，但主張若要找尋不列顛真正的起源，必須回到本土最古老的語言——古不列顛語(即威爾斯語)。也因此，他更重視「吟遊詩人」(Bardi)所遺留之「最古老的斷簡殘篇」，以及「用古不列顛語所寫的歷史」。他提醒讀者切不可相信羅馬人以拉丁文扭曲後的人名或地名，唯有「回到我們自己天生的語言，才能讓不列顛真正的名字重見光明」。⁸³

勞伊德重視本土語寫作及詩歌口語傳統的立場，乃延續了利蘭、普萊斯等人的主張。普萊斯指出，古代不列顛使用文字的時間並不晚於羅馬，早已有本土的記載。雖然一般人認為古典作家較為傑出，但這些作家既不關心，也不了解遙遠他鄉的事物，唯有本土記錄者以自己的語言所傳承之文獻，才是最真實可信的。他認為：

比較可靠的做法，是相信那些真正看到[事件發生]的人，不論他們對語言的運用有多粗糙，……或至少是事件在人們的記憶中依舊清晰時，所留下的紀錄。……無論如何，要從那些真正看見它們的人，所留下之可信的報導，了解相關事物。這樣的權威，

⁸²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30–148. 比德為英格蘭修士，其作《英格蘭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c. 731)以拉丁文寫成，影響英格蘭歷史書寫至為深遠。

⁸³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B5v, B6v–7r. 為了讓讀者接觸古不列顛語，勞伊德在《不列顛簡評》書後，還附上古不列顛語和拉丁語名詞對照表，見 N7r–8r.

比起那些用精緻花俏的文字寫成歷史的人，而且是倚賴已經被政治動盪及時光所摧毀和侵蝕的文獻所寫成的，更值得相信。⁸⁴由此看來，可靠的文獻取決於記錄的時間和人，越接近事件發生當時的紀錄越好；越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越好。普萊斯認為，不論是威爾斯當地永不磨滅的「詩歌」，或常民在日常生活中講述的故事，都值得採納，因為這些都奠基於古老的「記憶」。⁸⁵換言之，不列顛本土的記載遠勝於外國人所留下的，至於是否以優美的古典文字所寫，並不重要。那麼，完全不懂古不列顛語，又是外國人的維吉爾，在本土語派看來，根本不具判斷不列顛史真偽的能力；他只會對羅馬人的勝利慷慨頌揚，對布立吞人真實的成就吝於讚美，一切都只因為羅馬人是「他的自己人」。⁸⁶

勞伊德等人對維吉爾的批評，既出於對語言及文獻問題嚴肅的思考，也出於強烈的愛國心以及辯論的目標，因為唯有建立不列顛古語、古籍及口傳文化的可靠性，才能印證傑佛瑞依據古籍所「翻譯」之《不列顛諸王史》，以及口傳詩歌中所傳頌之亞瑟王事蹟的真實性。利蘭主張：不能因為古羅馬作家從未提及亞瑟，就說亞瑟根本不存在，而要回到「我們的祖先」——不列顛的「詩人和史家」，他們「對亞瑟

⁸⁴ Prise, *Historiae Britannicae Defensio*, 36–37, 24–25.

⁸⁵ Prise, *Historiae Britannicae Defensio*, 170–171, 234–239. 相同立場的利蘭也主張：親眼所見的記載，可信度更勝於外國作家所寫，最好史家自己能「耳證」(eare witness)、 「目擊」(eye witness)，並到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場聆聽與觀察。Leland,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L3v, E4v, G1v. 利蘭與普萊斯兩人在作品中也不斷提及「記憶」(memory)一詞，並將詩歌視為追尋民族集體記憶最重要的窗口。

⁸⁶ Llwyd, *Cronica Walliae*, 65; Prise, *Historiae Britannicae Defensio*, 170–171. 利蘭批評維吉爾對布立吞人充滿敵意，充分展露「義大利人的尖酸苛薄」，其所言皆「違反事實」。Leland,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G3v.

是如此友善、忠實與感激，既崇拜他的名聲與事蹟，也以永恆的記憶與稱頌來榮耀他」。⁸⁷這些本土詩人或史家的作品，包括九世紀威爾斯修士尼內厄斯(Nennius)以拉丁文所寫的《布立吞人史》(*Historia Brittonum*)、以威爾斯語流傳的《不列顛三合曲》(*The Triads* 或 *Trioedd Ynys Prydein*)，以及活躍於六世紀的威爾斯詩人塔利埃辛(Taliesin)、十二世紀的梅林(Meilyr Brydydd ap Mabon, fl. 1100–1137)的詩作等，⁸⁸都可以證明亞瑟曾打贏的 12 場戰役及各樣英勇事蹟。也唯有這樣的文獻，能夠驅散「無知的雲霧」，讓「不列顛古代的光芒」照射四方，「促進我國的榮耀」。⁸⁹

這些忠誠於威爾斯本土傳統及英格蘭王國的學者，甚至以蘇格蘭史家布思 1527 年的作品為證，因為布思接受傑弗瑞作品的真實性，也承認亞瑟之統治增進了不列顛的財富與權勢。⁹⁰不過，也正如他們所批評的，布思並不認為布立吞人統治的範圍涵蓋蘇格蘭，亞瑟也非對抗羅馬入侵唯一的英雄。布思一方面接受英格蘭的古史傳說及傑弗瑞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借用及模仿他們的書寫方式，利用「我們自己的編年史」(*nostris annalibus*)以及塔西陀的作品，編寫多位英勇國王浴血抵抗羅馬人的事蹟，如卡拉塔卡斯(Caratacus, 34–54 在位)、科布里德斯一世(Corbredus I, 54–73 在位)、科布里德斯二世(Corbredus II, Galdus, 76–111 在位)等。⁹¹但他所寫的內容，卻和威爾斯及英格蘭史家所理解的，或與塔

⁸⁷ Leland,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L3v, G2r.

⁸⁸ Leland,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C3r, D3v; Prise, *Historiae Britannicae Defensio*, 107, 209–213.

⁸⁹ Prise, *Historiae Britannicae Defensio*, 215–219; Leland,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M2v–3r.

⁹⁰ Leland,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F3v, G3v.

⁹¹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92, 163. 「我們自己的編年史」一句之中文翻譯，乃根據拉丁文版本，因貝倫登的蘇格蘭文譯文為‘vulgar Croniklis’(通俗的編年史)，意義較不明確。拉丁原文為：‘Horu gue

西陀所記載的，有非常大的出入。

以卡拉塔卡斯為例，塔西陀在《編年史》(*Annales*，寫於西元二世紀初)第十二卷，記載他反抗羅馬入侵的事蹟。他是奧爾德菲希斯(Ordovices)及西琉瑞斯(Silures)兩地(皆在今日威爾斯境內)的統治者，曾在崎嶇險惡的山野中對抗羅馬軍隊，也曾鼓勵布立吞人為擺脫奴役、追求自由而戰。⁹²布思接收了塔西陀對比自由與奴役的修辭，轉用於蘇格蘭古代歷史，而且把這位南方英雄變成了蘇格蘭國王。在布思的敘述中，這位國王在位時因布立吞國王難以抵擋羅馬壓迫，仗義出兵協助，並與布立吞人、皮克特人合作抵抗羅馬大軍。雖然西元 43 年時，羅馬皇帝克勞狄(Tiberius Claudius, 41–54 在位)的軍隊已成功征服不列顛南方，但布思指出，羅馬人從未攻下斯科特人的土地，證明了後者是「勇武的民族，不甘於受奴役」。⁹³布思接續提及不列顛南部受羅馬統治後，威爾斯多位貴族請求卡拉塔卡斯協助反叛，並擁戴他為聯軍最高指揮官。在戰爭的過程中，布立吞人及皮克特人因羅馬軍猛烈的攻勢，接連投降，唯有卡拉塔卡斯持續抵抗，在戰場上「捍衛他的領土和自由，至死方休」。布思最後以遺憾又敬佩的口吻，敘述卡拉塔卡斯戰敗，被俘至羅馬城，但他贏得了敵人的尊敬與皇帝的赦免，重回故國，且在和平中度過餘生。⁹⁴

再以科布里德斯二世為例。布思指出因其良善、誠實的品格，這

de Carataco, Corbredo, ac Galdo Scotorum regibus, his voluminibus memorie dedimus, nonnulla ex nostris annalibus, at longe vberiora ex Cornelio Tacito sunt depropta.' Hector Boece, *Scotorum historiae a prima gentis origine* (Paris, 1527), 74v.

⁹²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The Annal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ed. Moses Hadas; trans. Alfred John Church and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 264–267.

⁹³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86–91, 93.

⁹⁴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95–98, 104–105, 110–111.

位國王獲得「加爾達斯」(Galdus)的稱號，⁹⁵並在西元 70 至 80 年代擋住羅馬軍隊數波入侵，維持王國獨立。布思特別提及其中一場可歌可泣的戰役——「格勞庇烏山之役」(Battle of Mons Graupius)。⁹⁶這場戰役的羅馬統帥即塔西陀作品《阿格利克拉》中的主角，塔西陀的岳父阿格利克拉(Gnaeus Julius Agricola, 40–93)。有關這場戰役的描述，布思大幅借用塔西陀所寫，也模仿他的寫作風格，讓雙方將領在開戰前發表激勵軍心士氣的演說。⁹⁷在科布里德斯的講辭中，布思透過國王之口，強調這是一場為不列顛「自由」、為免受「奴役」而奮鬥的戰爭；他們身處世界最偏遠的一端，身後只有高聳的岩石與巨浪，沒有任何可逃脫之處。因此，他們這群「最勇武的阿爾比恩人」，將是抵擋羅馬稱霸世界的「最後一群人」。據布思所述，戰爭結果雙方死傷慘重，羅馬軍被殺者有 1 萬 2 千人，蘇格蘭聯軍傷亡則超過 2 萬，但成功阻擋了羅馬的攻勢。⁹⁸科布里德斯的故事，的確展現了蘇格蘭的自由與獨立，但若回到塔西陀原本的記載，當時對抗羅馬的蘇格蘭首領為卡加庫斯(Calgacus)，而非科布里德斯二世。布思在毫無歷史證據的支持下，逕將科布里德斯取代卡加庫斯，並以後者為模板，寫下動人心魄的一幕。透過此種套用，布思讓蘇格蘭在古羅馬帝國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因為他們擋下了羅馬征服世界之極的野心。

布思對傑出君主的描述，說明國族英雄是英蘇古史書寫中不可或

⁹⁵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129.

⁹⁶ 「格勞庇烏山」之真實地點，至今無法確認，大概位於蘇格蘭東北部山區，羅馬人稱為喀里多尼亞(Caledonia)的地區。戰役發生的年代也無法準確認定，可能是在西元 83 年。

⁹⁷ 見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Agricola, Germania*, trans. Harold Mattingly; revis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 B. Riv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19–23.

⁹⁸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148–150, 154

缺的內容，也是與敵對者相抗衡的武器。他不僅寫出自己的英雄，也將南方人抵抗羅馬人的事蹟，轉寫成充滿失敗與羞辱的故事(無法靠自己，總是需要蘇格蘭的援助)，而北方蘇格蘭所代表的，則是榮耀而成功的典範，由此對照出英格蘭長期受外族入侵及統治，蘇格蘭則維持獨立與自由的歷史事實。此種手段不免被後來的勞伊德大加撻伐，批評他錯將位於南威爾斯的西琉瑞斯，當成在蘇格蘭；把威爾斯人變成斯科特人，而「那時在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一支民族」。⁹⁹即使是與勞伊德對立的蘇格蘭史家布坎南，也無法認同布思的做法。他回到塔西陀的原作，指出在阿格利克拉北征之前，羅馬人並不知曉不列顛北方的狀況，遑論與蘇格蘭君主對戰，直到科布里德斯二世的時代，雙方才有軍事衝突，但這位君主絕不是「塔西陀所說的卡加庫斯」。¹⁰⁰

在語言和文獻問題上，布思不如勞伊德或布坎南那樣明確。他雖接受英格蘭的古史傳說，卻沒有明顯的本土語立場，並未致力挖掘古老蓋爾語(Gaelic)所留下的詩歌或文獻，而是和當時多數人文學者一樣，以拉丁文著作為主要參考文獻。但他又不屬於布坎南那般堅定的古典語派，他樂於接受中古時期蘇格蘭本土的作品，如約翰的編年史及費瑞蒙的記載，用以抗衡英格蘭本土文獻及歷史著作。不過，布思寫作的年代，語言或文獻問題還未如此尖銳，是到了勞伊德和布坎南的時代，才成為疑古派與信古派之間關鍵性的差異。其所連結的不僅是古史問題，也是文化認同及文明化的問題。勞伊德主張書寫做為文明化的標誌，早已在上古時期進入不列顛，以不列顛古語流傳的詩歌即是不列顛文化的精髓，也是英格蘭王國整體文明與記憶之所繫。布坎南則認為，最古老的未必最完美，如同世上所有事物，語言也經歷從萌

⁹⁹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sig. F1r-2r.

¹⁰⁰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74, 176.

芽至成熟的歷程，從生嫩、粗淺到不斷地改進與美化；從野蠻人粗糙的發音與不精準的用詞，慢慢轉化為知識分子悅耳且高雅的語言。後者才是我們應當看重的。¹⁰¹

對布坎南來說，語言是「品味」問題，也是「選擇」的問題，若有人捨棄好吃的「穀物」(corn)，寧願選擇乾硬的「橡實」(acorns)，他也不會阻攔。可是：

我情願選擇對古布立吞人野蠻的地方語毫無所知，也不要失去拉丁語的知識，那是我從孩提時期就耗費大量功夫學會的。我對逐漸消失的蘇格蘭古語，不感到任何遺憾，而且會高興地讓那種難聽的聲響消亡，被溫柔和諧的拉丁語調所取代。如果在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的過程中，我們必得失去一物，以換得另一物，就讓我們從粗鄙、野蠻(rusticity and barbarism)，轉向文化與文明(culture and civilization)；讓我們[現在]的選擇和判斷，彌補出生時的不幸。……讓我們擦亮已被這世界大多數地區公開接受的希臘文和拉丁文，並泯除野蠻語言帶給它們的髒污。¹⁰²

此立場明顯地以拉丁文為尊，甚至將拉丁文之使用與文明化相聯繫，同時意味著不列顛諸族群的文明化，始於羅馬語言及文化之引入，而非源自本土。¹⁰³

若說布坎南追隨的是十五世紀義大利人文學者尊崇拉丁文的古典主義(classicism)，那麼勞伊德等人則是加入十六世紀最新的人文學潮流——「本土語人文主義」(vernacular humanism)。從十五世紀中葉起，人

¹⁰¹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8–9.

¹⁰²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9.

¹⁰³ 布坎南將羅馬視為不列顛文明的引入者，此立場與先前的維吉爾及後來的卡姆登一致。見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77; Camden, *Britain*, F1v-3r.

文學者間展開長期的「語言之爭」(questione della lingua)，辯論拉丁文優美的標準、本土語和拉丁語的地位高下，甚至「古代」與「現代」孰優孰劣等問題。隨著印刷書籍的流通、商人階級藝文需求的提升，越來越多人文學者主張應將古代典籍翻譯為本土語，或親身投入本土語寫作，提升本土文學的水準。代表人物如威尼斯人文學者班波(Pietro Bembo, 1470–1547)、法國人文學者杜·貝萊(Joachim du Bellay, 1522–1560)及其他「七星詩社」(the Pléiade)的成員。蘇格蘭的知識分子也因多在巴黎訪學，早在 1530、40 年代就受到法國本土語人文主義的影響。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及不列顛地區都可見到本土語的寫作及其語言地位正在興起中。¹⁰⁴

布坎南與勞伊德之間有關語言及文獻的爭辯，正是上述知識發展與辯論中的一環，而語言及文獻問題，也同時是他們建立古史認識論的鎖鑰，各從古典語和本土語開拓獲取古史真實知識的道路，以及檢驗古史真偽的方法。若從辯論的角度，而非歷史真偽的角度來看，勞伊德等人的本土語立場在當時別具新意，他們可據此主張：古代希臘或羅馬作家能精確描述的，只有他們自身熟悉的事物，對於遠離其世界的邊陲地區，通常不關心、不理解，也疏於記載或記載錯誤。因此，不列顛地區的古代民族及歷史，必須靠自己的語言、有限的文字記載、殘留的文物或地景遺跡，拼湊出過往歷史的樣貌。這樣的立場，也使普萊斯、勞伊德等人，成為歐洲知識史上第一批強調口述傳統和集體

¹⁰⁴ Christopher S. Celenza,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apter 6; 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84–84, 303–304; Roger A. Mason, “Dame Scotia and the Commonweal: Vernacular Humanism in *The Complaynt of Scotland* (1550),” *The Mediaeval Journal* 10:1 (2020): 129–150.

記憶之重要性的學者，¹⁰⁵在文字資料缺乏的狀況下，奮力建構國族的獨特性與悠久性。

四、島名與島民

布坎南與勞伊德不同的語言立場，也左右了他們對另兩項議題的態度與觀點。一是名稱問題，不列顛島最初的名稱為何、出自何處？一是族群問題，最早遷入此島且定居立國的民族是哪一支？主宰此島嶼政治與文化的民族是單一的，還是多元的？此兩議題皆牽涉了英蘇相對的政治地位。本土語派的勞伊德主張：若要真確知曉不列顛最初的名字，必須從第一支移民所說的古語中得知，也就是古代布立吞人的語言，而非從希臘文或拉丁文中尋找。¹⁰⁶他知道古代希臘、羅馬人稱此島為「阿爾比恩」或「不列塔尼亞」，但哪一個名稱更古老？又源出於何處？¹⁰⁷查究威爾斯的「古書」，他發現此島一貫被稱為 *Ynys Prydain*，意思是「不列顛島」(Iland of Britayne)。他認為「凡事懂得這個語言的人，都能輕易確認：布立吞人在他們的語言中，稱此島為 *Prydain*」。只是對羅馬人而言，這個名字的發音過於「生硬」，所以他們改為較「柔和」、「悅耳」的 *Britannia*，並將其人民稱為 *Britanni*。他進一步解釋，在布立吞人的古語中，沒有任何一個字是以 *B* 開頭，只有 *P* 開頭的字有時可換為 *B*、*PH* 或 *MH*。簡言之，羅馬人借用了布

¹⁰⁵ Schwyzer,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84–85, 95.

¹⁰⁶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B5r–v.

¹⁰⁷ 對於不列顛島被稱為「阿爾比恩」的原因，有多種說法，見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B4v; *Prise, Historiae Britannicae Defensio*, 113–117. 或見 James P. Carley and Julia Crick, “Constructing Albion’s Past: An Annotated Edition of *De Origine Gigantum*,” in *Glastonbury Abbey and the Arthurian Tradition*, ed. James P. Carley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1), 347–418.

立吞人的稱呼，但改用較溫和的發音。他推論 *Prydain* 是由兩個字合併而成——*Pryd* (白色之意)和 *Cain*(美麗之意)，為便於發音，省略了 *C*。此名之意為「潔白或極盡之美」，意指不列顛是一座「美麗、肥沃」之島。¹⁰⁸

勞伊德對島名的主張，其實推翻了英格蘭史家傳統的說法，大異於同時代且同樣為本土語派的利蘭和普萊斯。他們主張：不列顛島及其最初居民的名字，皆源於布魯特斯。勞伊德雖然也是特洛伊起源傳說的擁護者，但他認為島嶼名稱的起源和族群名稱不同，「布立吞人」(單數為 *Britunn*，複數為 *Brython*)之名，與島嶼的古名(*Prydain*)無關，確實來自「布魯特斯，這位國王」。而之所以把 *Brutus* 原名中的 *u*，寫為 *Britunn* 中的 *i* 或 *Brython* 中的 *y*，是因為在古語中通常以 *i* 或 *y* 取代 *u*。¹⁰⁹勞伊德的主張繼續鞏固了布立吞人源自特洛伊人的說法，也藉此反駁了義大利人維吉爾、蘇格蘭人布思的主張。

維吉爾的主張乃延續八世紀英格蘭修士比德的論點，認為大洪水後不久，即有法國阿摩里卡地區(*Armorica*，現在的布列塔尼[*Brittany*])的布立吞人移居不列顛南部，並以自己的族群名稱呼此島為「不列顛」；原居地則有了「小不列顛」(*litle Britayne*)之稱。至於「阿爾比恩」一名，維吉爾推斷同樣來自該地，而且暗示它出現的時間更早。他指出天氣晴朗時，從法國海邊就可望見不列顛島，若在海上航行，也能清楚看見島嶼海岸邊的白色懸崖，所以古時那裡的人稱此島為「阿爾比恩」，源自於希臘文 *alba*，白色之義。「不列顛」與「阿爾比恩」兩詞，後來有了區隔，根據羅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8)所說：大島被稱

¹⁰⁸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B7r–B8v.

¹⁰⁹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B5r, B8r, C1v. 普萊斯在其作品中也說明 *u*、*i*、*y* 三者在威爾斯語中相通。Prise, *Historiae Britannicae Defensio*, 86–89.

為阿爾比恩，「其他周邊諸島合稱為不列顛(Brittain)。」¹¹⁰簡言之，維吉爾主張不列顛最初的島民，非來自遙遠的特洛伊，而是鄰近的法國地區，島嶼之名亦如是。

這個說法在勞伊德看來真是匪夷所思。他指出，阿摩里卡的布立吞人，是暴君馬克西姆斯(Maximus the Tyranne, d. 388)為應付歐陸的戰爭，而從不列顛島徵召的士兵。戰爭失敗後，這群人留居該地綿延後代，因此日後與不列顛有相近的民族和語言。¹¹¹此與維吉爾所主張的移民路線，完全相反，也透露出他們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不列顛最初的島民來自何處，是特洛伊的後代或是高盧的布立吞人？另一個差異在於「不列顛」與「阿爾比恩」兩詞，何者較早出現？勞伊德選擇了前者，而維吉爾以及同樣被勞伊德批評的蘇格蘭史家布思，選擇了「阿爾比恩」。布思延續的是蘇格蘭中古史家約翰的說法：此島最初的名字是「阿爾比恩」(因白色崖壁)，且指整個島嶼，而南方布立吞人佔據的地方稱為「不列塔尼亞」；北方斯科特人聚居之處則稱為斯科提亞(Scotia)。¹¹²布思與其前輩都承認不列顛之名出於布魯特斯，但他們認為不列塔尼亞(不列顛)之名非指全島，而僅指布立吞人所生活的區域。因此，即使英格蘭史家主張其王國完全繼承了布立吞人的領土和政權，它統治範圍的也不及於蘇格蘭，因為自古不列顛一名就未涵蓋蘇格蘭地區。

布思從島名之辯，闡述了蘇格蘭政治獨立的悠久歷史。他當時所面對的不僅是英人對全島統治權的宣稱，也面對蘇格蘭內部的古史

¹¹⁰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14, 32. 比德的說法見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ed. Bertram Colgrave and R. A. B. Mynors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16–17.

¹¹¹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C2r.

¹¹² 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5, 30–32.

辯，他的對手、主張兩國統一的麥爾，雖然也接受此島最古老的名稱是「阿爾比恩」，但主張最早居住於不列顛的人來自對岸的阿摩里卡地區，而非特洛伊或埃及。¹¹³此立場與同為疑古派的維吉爾一樣，而且麥爾還主張：「不列顛最初只有一個王國，就是布立吞人的王國。」即便後來分為英蘇兩王國，「所有在不列顛出生的就是布立吞人」，都是此島的「原住民」；就如所有在高盧出生的人，皆稱為「高盧人」。麥爾可謂以古代的布立吞人之名，為他自己的時代創建了一支新的民族，以新的「布立吞人」涵蓋全島住民，而且他認為只有這個方式才能「與其他民族區隔」。¹¹⁴麥爾其實是以復古的方式，闡述未來英蘇的統一，與英格蘭學者建立在布魯特斯或亞瑟之上的統一主張，殊途同歸。

布思與麥爾及勞伊德之間的差異，也帶出本節所關注的第二項議題：不列顛歷史的起源乃建立在單一民族上，還是多元民族？不論是從高盧跨越海峽而來，或從特洛伊遠渡重洋而來，麥爾和勞伊德等人都主張古代布立吞人所建立的，是一涵蓋全不列顛島及周邊附屬島嶼的王國，後來才依序有皮克特人、斯科特人、羅馬人、薩克森人等移入。¹¹⁵那麼，所謂的不列顛古史，就是以布立吞人為根基的歷史，其他民族都是晚到加入的。可是不願屈服於南方統治的布思，跟隨中古史家約翰的敘述，一方面點出斯科特人本身就是混雜的民族(兼合了希臘人與埃及人)；另一方面陳述古代不列顛多民族共存又分立的現象。布思

¹¹³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1–4.

¹¹⁴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17, 18.

¹¹⁵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17; Llwyd, *Cronica Walliae*, 63;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F2v–3r. 勞伊德明確寫出布立吞人統治不列顛群島的年代：西元前 1137 年至西元 688 年，並主張後來英蘇王室的血統(都鐸及斯圖亞特王朝)都源於威爾斯。

指出古代不列顛「從初始就有三支不同的民族」，依照移入阿爾比恩的先後，先是布立吞人，再來是斯科特人，最後才是皮克特人。¹¹⁶他們所居之處由南至北，依照族群名來命名，依序是「不列顛」(Britane)、「皮特蘭」(Penthland)及「蘇格蘭」(Scotland)。這些人可合稱為「阿爾比恩人」(Albianis)，但他們來自歐洲不同地區，說著不同的語言，有各自的習俗和文化，甚至外貌也有差別。例如，皮克特人髮色較黃，斯科特人髮色較黑而卷，跟西班牙人相近(他們的祖先就是輾轉自西班牙而來)。¹¹⁷因此，對布思來說，不列顛古史(更正確地說是阿爾比恩的歷史)是一部多語、多民族、多王國共譜的歷史。

布思與麥爾對蘇格蘭內部族群及其語言也有不同的看法。麥爾刻意區隔蘇格蘭高地(Highlands)與低地(Lowlands)的差異，¹¹⁸他將高地區(蘇格蘭北部、西北部及周邊島嶼)的斯科特人，稱為「野蠻斯科特人及島嶼斯科特人」，指出他們所用的語言是愛爾蘭語，或應稱「破愛爾蘭語」(broken Irish)；低地區住的則是「文明化的斯科特人」，這些人和南方的英格蘭人生活方式更為相近，且共同使用此島嶼主要的語言——英文。¹¹⁹在語言和文明化的基礎上，麥爾貶低蘇格蘭中古以來所尊崇的愛爾蘭起源，以及斯科特人最早聚居的高地區。高地與低地的區隔，在他看

¹¹⁶ 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24, 25–27;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xxii. 布思有別於多數十六世紀參與古史辯的史家，主張斯科特人早於皮克特人移入不列顛。

¹¹⁷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xxi–xxii.

¹¹⁸ 將高地區、低地區視為兩個不同文化區域的概念，在十四世紀萌芽，至麥爾所處的十六世紀更為明顯。見 Jane Dawson, “The Gaidhealtach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cottish Highlands,” in *British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The Making of Britain 1533–1707*, ed. Brendan Bradshaw and Peter Robe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9–300.

¹¹⁹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17–18, 54.

來，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線，不僅語言不同，生活方式、禮儀道德、政治狀態都不相同：高地人奔走於山林之間，身體較為強健、善於戰鬥；低地「定居的斯科特人」(householding Scots)，衣著及禮儀則較為精緻，聰明智慧勝過北方的人，也有較良好的政府體制。¹²⁰類似看法也見於同時代的維吉爾，及 1560 年代的勞伊德，這兩人都指出高地斯科特人特殊的衣著，穿著番紅花(saffron)染色的內衫，外披斗篷，赤足，持弓箭，與愛爾蘭的風俗相近。勞伊德還認為蘇格蘭南部的人其實來自英格蘭，而非「真正的斯科特人」；這些人因征服者威廉(William I, the Conqueror, 1066–1087 在位)的入侵而逃入蘇格蘭，至今仍以「英格蘭人」為榮，且鄙視蘇格蘭北部「粗魯又野蠻的」斯科特人。¹²¹

相較於麥爾(或後來的勞伊德)刻意將蘇格蘭低地居民與英格蘭人視為一體，布思則強調蘇格蘭與愛爾蘭的聯繫，以及高地人傳統且樸素的尊貴性。他指出，早在創世後 4617 年(約西元前 665 年)，¹²²就有愛爾蘭王子羅撒西(Ethachius Rothesay)，帶著隨從踏上蘇格蘭西邊小島，成為最早進入阿爾比恩的斯科特人。他們以斯科塔和蓋提祿斯之子希伯(Hiber)的名字，將最初抵達的小島命名為「赫布里底」(Hebredes)，又以斯科塔之名將大島上所佔有的區域稱為「蘇格蘭」。¹²³這個區域即傳說中西元

¹²⁰ Mair,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47–49.

¹²¹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10–11;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F5r–v.

¹²² 布思文中只提及創世年(anno mundi)，未提及西元年，此處之計算乃依據中古時期比德所推算的耶穌誕生之年：創世後 3952 年。Bede the Venerable, *Bede: The Reckoning of Time*, trans. Faith Walli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5.

¹²³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xxi. 相關敘述也可見 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17–24. 這段敘述另有一重要意義，即布立吞人進入愛爾蘭之前，此島早已有斯科特人居住，而非如中古英格蘭史家(如傑弗瑞)所述，為一無主之地。傑弗瑞的說法見

前 330 年佛格斯一世建立蘇格蘭王國時的領土，亦名為「達爾里阿達」，位在蘇格蘭的高地區，日後王國的領土才逐漸向低地區延伸。所以，不僅蘇愛兩地居民有相同的民族根源，蘇格蘭的建國亦源自愛爾蘭移民，高地區則是整個蘇格蘭王國與愛爾蘭的連結點。布思也強調兩地居民無論禮儀、風俗、語言各方面都非常相近，尤其是高地斯科特人仍保留著古時的傳統，「未接觸外國來的商品、未墮落，也不與外人血統混雜，因此更為強壯而質樸，也比其他阿爾比恩的人更能承受飢餓、奔走與困乏。」布思毫無保留地稱讚他們能夠抵擋一切危險，身體敏捷、武藝高強，而且「以最嚴格、忠誠的方式，持守他們的信仰與諾言」。¹²⁴

在布思筆下，蘇格蘭高地保留了固有的道德和勇武精神，也保存蘇格蘭人舊有的語言；高地人的斗篷、赤足、弓箭狩獵等日常生活方式，以及通用的蓋爾語，並非野蠻的象徵，而是古人純樸、節制、強健的延續。至於低地區，由於時常受到英格蘭人語言及風俗的污染，尤其是在馬爾科姆三世(Malcolm III, Canmore, 1058–1093 在位)統治時期，沾染過多南方語言和奢華的風氣，而變得「陰柔又軟弱」。¹²⁵布思的寫作策略，可謂沿襲古羅馬史家李維、塔西陀的筆法，以「高貴的野蠻人」反思自身及當代文明，也透過頌揚高地人傳統且樸素的尊貴性，翻轉「文明的英格蘭」與「野蠻的蘇格蘭」、「文明的低地區」與「野蠻的高地區」之對比。¹²⁶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78–79.

¹²⁴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xxi, xxvi.

¹²⁵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liv–lxi.

¹²⁶ 有關十六世紀蘇格蘭野蠻或文明形象的討論，見 Roger A. Maso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elts: Hector Boece,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Ancient Scottish Past,” 95–119; Arthur H. Williamson, “Scots, Indians and Empire: The Scottish Politics of Civilization 1519–1609,” *The Past and Present* 150

上述有關英蘇史家對島嶼名稱和民族源流的辯論，到了 1580 年代，蘇格蘭史家布坎南透過不列顛境內各語言間的連結，以及與古典語和歐陸語的對比，建立了他的語族學(linguistic ethnography)，並提出有別於傳統的看法。¹²⁷他本人雖然出身蘇格蘭高地、成長於蓋爾語的環境下，也和布思一樣欣賞高地居民原始而素樸的生活狀態；¹²⁸但他認為，在追求歷史事實的道路上，應跟隨最成熟而文明的語言，而非原始、野蠻、未經打磨和進化的古不列顛語或蓋爾語。¹²⁹相較於從不列顛古語中找答案的勞伊德，布坎南主張不列顛島的古名應從古代希臘、羅馬人的用法中發掘。

首先，如同疑古派的麥爾和維吉爾，布坎南主張「阿爾比恩」是此島最古老的名稱，而且也在蘇格蘭沿用至今，人們稱自己為「阿爾巴尼須」(Albinich)或「阿爾比恩人」(Albins)，稱王國為「阿爾濱」(Albin)。但與其他史家不同的是，布坎南以他對希臘文的知識推論，阿爾比恩一詞並非源自「白色」之義，或不列顛南部海岸的白色懸崖，而是指

(February 1996): 46–83.

¹²⁷ 布坎南是第一位將不列顛島上的蓋爾語、古不列顛語及皮克特語連結，並探討它們之間相近性的人文學者，也被認為是第一位指出不列顛居民皆屬「塞爾特人」(Celts)的學者。參見 John Collis,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Celts in Britain,” in *Celtic Conne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eltic Studies, Volume I: Language, Literature, History, Culture*, ed. Willia Gillies, Ronald Black and Roibeard O Maolalaigh (East Linton: Tuckwell Press, 1999), 91–107. Lorna Hutson, *England’s Insular Imagining: The Elizabethan Erasure of Scot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224.

¹²⁸ 布坎南的《蘇格蘭史》中對蘇格蘭高地區，特別是赫布里底群島、奧克尼(Orkney islands)及謝德蘭群島(Shetland islands)居民生活方式，有諸多描述。稱讚他們具有「不經雕琢的粗獷和堅毅」，不被「野蠻的奢華」污染原始淳樸而堅毅的精神。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41, 57–58, 63.

¹²⁹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8–9.

「高度」。他舉出歐洲多處山脈、位於山中的城鎮，或海拔較高的河流，名稱中都有 *Alba* 或 *Alpa* 的字根；而且高度是一種恆常現象，白色卻只在冬日雪季出現，因此此字根指的是高度，而非顏色。他更進一步推論，古人航行於海面時，可對照不列顛島和愛爾蘭島地勢高低，因此稱沿岸有高聳崖壁的不列顛為「阿爾比恩」。¹³⁰

布坎南繼而指出，雖然阿爾比恩是最古老的名字，古代對此島最通用的稱呼卻是「不列塔尼亞」，而且早在西元前四世紀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E) 的作品中，已提及此名。他認為這是希臘人取用當地人對自己的稱呼，也最接近當地人的發音，而且被不列顛周邊的高盧人和日耳曼人所接受。在他看來，這是古代萬國通用，亦被飽學之士所用的稱呼，勞伊德卻要用渺遠不可考，來自無知、不識字的吟唱詩人所用的古語取代，這不過是一種「自吹自擂」的古代性。¹³¹在島名問題上，布坎南不斷以語言之野蠻或文明，批評勞伊德，質疑他為何要對「外國的名稱」極端焦慮？為何不接受成熟、有教養與品味的拉丁文？又為何如此喜愛古不列顛語的野蠻，卻要用拉丁文寫自己的作品？¹³²

接下來，布坎南處理另一個延續自布思的問題：不列塔尼亞(或不列顛)指的是全島還是其中一部分？他指出希臘、羅馬人用此稱涵蓋全島，甚至整個不列顛群島，但英格蘭本土史家的用法，卻非常混亂。以八世紀的比德為例，他有時以「不列顛」指全島，有時用以指布立吞人的國度或羅馬人統治的省份；十二世紀的英格蘭史家，如傑弗瑞及馬姆斯伯理的威廉 (William of Malmesbury, c. 1095–c. 1143)，則以「不列顛」指

¹³⁰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6–19, 103.

¹³¹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7–8.

¹³²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9–10.

「哈德良長城」以南的區域，但下一代的史家又以不列顛指稱全島。¹³³布坎南體認到名稱總隨著時代及使用者而改易，但他的立場仍是跟隨古典用法，也主張這是當時最普遍的用法，即以「不列顛」稱全島，涵蓋其中的英蘇兩王國。

同樣的，布坎南也接受古代希臘、羅馬人稱全島居民為「布立吞人」，但關於這些人的起源及內部的區隔，他卻有不同於前人的推論。他主張，布立吞人最初的確是從鄰近的高盧渡海而來，但不是比德所說的阿摩里卡地區，而是源自距離不列顛更近，高盧東北海岸的莫里尼人(the Morini)。¹³⁴再者，不論布立吞人或斯科特人，全都來自高盧，他們分享相近的語言、信仰、作戰方式，可和歐陸的高盧移民統稱為「高盧人」(Gauls)或「凱爾特人」(Celts)。¹³⁵布坎南依據古代地理學者史特拉波(Strabo, c. 64 BCE–c. 24)、老普林尼、梅拉(Pomponius Mela, d. c. 45)、奧羅修斯(Paulus Orosius, c. 375–c. 420)等人所留下的記載，指出古代高盧雖土地肥沃，但人口增長甚速，糧食難以為繼，便有一波又一波的人群離開原居地，往外建立新天地。他們先移至鄰近的西班牙地區，後來有的往東、往南，進入義大利、希臘及日耳曼地區；有的往西、往北，遷移至斯堪地那維亞及不列顛。¹³⁶布坎南進一步指出，不列顛接收的是來自原鄉的高盧人；愛爾蘭的斯科特人則來自遷徙至西班牙北部海岸

¹³³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2–13.

¹³⁴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5–16. 布坎南所說的「莫里尼人」主要居住於「比利時高盧」(Belgic Gaul)地區，在今日的法國北部、比利時、盧森堡一帶。他也指出 Morini 一詞的字根是 More，在古高盧語中指的是「海」，此詞原義為居於海濱(inhabiting the sea)。

¹³⁵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79. 布坎南指出這些人四處遷徙，從東邊的色雷斯(Thrace)到西邊的愛爾蘭都有他們的部落，雖散居於歐洲各地，但享有相近的語言。

¹³⁶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79–82.

的高盧人，他們因地利之便，或為逃避戰亂而遷入更西邊的島嶼。之後，又有數波移民再從愛爾蘭遷至蘇格蘭，因此在早期的編年史或比德的作品中，為區隔愛爾蘭和蘇格蘭地區的移民，而有「愛爾蘭斯科特人」(Irish Scot)和「阿爾比恩斯科特人」(Albin Scot)兩詞。¹³⁷

布坎南對於蘇格蘭另一支民族，居住於東部的皮克特人，也提出新的看法。中古時期英蘇史家多跟隨比德的說法，主張皮克特人來自斯基泰(Scythia)；十六世紀的布思和勞伊德則認為皮克特人的原居地，應在較近的丹麥和挪威。¹³⁸但布坎南從皮克特人的語言和風俗來看，主張這群人也源自高盧，先由該處向東遷徙至波羅的海、多瑙河周邊及斯基泰地區，日後因被他族所迫，航行至愛爾蘭，得到當地斯科特人的協助後，再遷徙至蘇格蘭定居。這條移民路線，將蘇格蘭史家約翰至布思向來主張的「斯基泰—愛爾蘭—蘇格蘭」路線，往前延伸為「高盧—斯基泰—愛爾蘭—蘇格蘭」。布坎南也強調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在「血緣、語言、風俗」上的相近性，他們和布立吞人一樣都有紋身或刺青的習俗。¹³⁹即因為兩族的親近性，皮克特人在遷徙的路上，才能得到斯科特人的援助與通婚，也能和後來移至蘇格蘭定居的斯科特人，在短時間內彼此交融「幾乎成為一國」。¹⁴⁰

¹³⁷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83–85.

¹³⁸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6–17; 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4, 25–27;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F4r; Boece,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xxi–xxii.

¹³⁹ 布坎南指出，上古時期各地高盧人都有以藍色染料紋身或刺青的習俗，包括不列顛群島境內各族、日耳曼地區的阿利人(Arii)、今日東歐達契亞(Dacia)境內的阿加蒂爾西人(Agathyrsi)等。皮克特人的稱呼(Picts)原義即為「刺畫」。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85–88.

¹⁴⁰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89–90.

在布坎南的解釋下，勞伊德所主張的布立吞人優先性，被更大範圍的高盧移民所消抹；原先布思所主張三異族並存共榮的圖景，則轉向單一民族但多支的繁衍與發展。布坎南主張布立吞人、斯科特人、皮克特人皆源自高盧，也和高盧人分享相同的語言；他們之間語言的差別，只是同一語言內部的「方言」(dialects)，而且在薩克森人進入不列顛之前，三支族之間不需要翻譯即可彼此溝通。¹⁴¹他也推斷這三者進入不列顛的時間相距不遠(只是他無法給予明確的年代)，在布立吞人定居後不久，即有皮克特人遷入，接著是斯科特人。後兩者抵達不列顛的時間，並非勞伊德所主張的在西元三、四世紀之後。¹⁴²在此基礎上，不列顛古史仍可視為三者共構的歷史，布立吞人、斯科特人、皮克特人都是「不列顛原始的居民」。¹⁴³

與布思相較，布坎南並不強調蘇格蘭境內斯科特人的優位。他不主張其起源比布立吞人更早，也不認為他們早於皮克特人定居於蘇格蘭，而是以比德、吉爾達的著作為本，追隨維吉爾及麥爾的看法，主

¹⁴¹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90.

¹⁴²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20–121. 勞伊德的說法，見 Llw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F4r–5v. 他認為皮克特人佔有蘇格蘭境內的喀里多尼亞，約是在 290 年左右，斯科特人從愛爾蘭遷移至蘇格蘭定居的時間，則遲至四世紀；斯科特人建國時間更晚，大約在 420 年。

¹⁴³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15. 布坎南的主張較接近現代對不列顛上古族群及語言的研究結果，三族群的語言皆屬於凱爾特語(Celtic language)，只是分支不同。參見：William Ferguson,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Picts,” *Scottish Tradition* 16 (1990–1991): 18–32; Norman Davies, “The Painted Isles, c. 600 BC–AD43,” in *The Isles: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101; G. R. Isaac, “Insular Celtic vs. Gallo-Brittonic: An Empirical or a Methodological Question?” in *Celtic Connections: Papers from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eltic Studies*, vol. 2, ed. W. Gillies and D. W. Harding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05), 190–202.

張皮克特人是第二支移入的族群，當時斯科特人仍「居於愛爾蘭」。¹⁴⁴再者，布坎南更重視三者共同的起源和語言。在同時否定特洛伊傳說及斯科塔傳說的立場下，他縮短了英蘇歷史的長度，但建立了彼此的共時性，享有相近的歷史起源，所有不列顛早期的居民皆可稱為布立吞人或不列顛人，亦可在島嶼上平起平坐。從政治意涵來看，布坎南的主張具有兩面特質。一方面，在相同起源及共有名稱下，他為日後英蘇王位聯合或兩國統一奠定理論依據，呼應其前輩史家麥爾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鋪陳 1603 年後詹姆士國王的不列顛帝國夢。¹⁴⁵另一方面，他確立了蘇格蘭長期享有政治獨立與自由的地位。他在作品中從未明確主張英蘇聯姻或政治統一，反倒指出：相對於布立吞人受羅馬征服並統治近 500 年，斯科特人與皮克特人至今從未失去自己的政權。¹⁴⁶此兩面性，或許可讓我們在統獨立場上，將布坎南置於布思和麥爾之間。

布坎南所主張的共時性，讓英蘇兩王國的古代性不相上下，至少都在羅馬入侵前數百年，但也正在此觀點上，布坎南激起英格蘭學者卡姆登的反駁。雖然卡姆登寫不列顛古史的出發點與布坎南相近，論證方式也受到他的影響，¹⁴⁷但在皮克特人及斯科特人的起源問題上，卡姆登不同意布坎南的說法，批評他「雖是一位具有深刻洞見的人，卻所見甚微，或獨見自身」；甚至語帶諷刺地說：布坎南的主張是以自身的「假想」或「發明」自娛自樂，遠離了史家應追求的真實。¹⁴⁸

¹⁴⁴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89.

¹⁴⁵ 布坎南或許並不排斥英蘇聯合的可能性，尤其是 1570–1580 年代許多人預料詹姆士六世將繼承英格蘭王位。參見 Mason, “Scotching the Brut,” 74–75. 但他在作品中未清楚表示立場。

¹⁴⁶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14.

¹⁴⁷ Camden, *Britain*, B5r–5v.

¹⁴⁸ Camden, *Britain*, K4r, K6v–L1r.

卡姆登指出，布立吞人才是不列顛島最古老的居民，同時也是最先居住於愛爾蘭的民族(而非斯科特人)。再者，他認為皮克特人並非來自斯基泰或日耳曼，而是「道道地地的布立吞人」，或可稱為「北方布立吞人」(Northern Britons)，是由原居於南方的布立吞人，受到羅馬人壓迫後移往北境。¹⁴⁹此一看法，與中古以來傳統的主張差距更大，但也藉此新說法，卡姆登將古代布立吞人定居的範圍擴及愛爾蘭及蘇格蘭，為英格蘭對此兩地的統治權建立自古以來的合法性。

卡姆登亦重新梳理斯科特人的起源，藉此貶低此族的悠久性與文化地位。他引用聖依西多祿(St. Isidore of Seville, c. 560–636)在《萬民源流》(*Etymologiae*)中的說法，認為「斯科特」一詞源自該族以多樣圖案紋身的習俗，並推論斯科特人的來源可能有三。一、他們是從愛爾蘭移入蘇格蘭的布立吞人；二、從日耳曼遷移至西班牙，再至愛爾蘭，最後到蘇格蘭定居的哥德人(Goths)；三、最可能的情況是，多族群移民在愛爾蘭混雜後成為一「大雜燴」(a mishmash of sundry nations)，再遷移至大島。¹⁵⁰但不論哪一種，卡姆登認為，斯科特人移入不列顛的時間遠晚於布立吞人。而且他在西元三世紀末羅馬人的文獻中，才找到歷史上首次提及斯科特人的證據，因此他推論斯科特人是三世紀之後漸次移居不列顛，不可能在西元前數百年就已建立王國。儘管卡姆登能用準確的文獻，證明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是三世紀，也從族名的原義推斷其起源，但並未能在詞語分析上超越或推翻布坎南之

¹⁴⁹ Camden, *Britain*, K1v–K4r. 卡姆登對皮克特人的理解與現代學術研究的結果差異較大，目前多主張皮克特人自成一族，且其祖先早自鐵器時代即居住於蘇格蘭地區。Michael Lynch, *Scotland: A New History* (London: Pimlico, 1992), 7, 14–17; Sally M. Foster, *Picts, Gaels and Scots* (London: B. T. Batsford, 1996), 13–14.

¹⁵⁰ Camden, *Britain*, K4r, K6v.

說。他先是明白地承認：「居住於今日稱為法蘭西境內的古代高盧人，和此島的布立吞人說的是完全一樣的語言，由此可理所當然地歸結出布立吞人源自高盧人。」¹⁵¹其後有關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的起源分析中，又間接承認了兩者與布立吞人在語言和風俗上的相近性。這場古史辯最終仍然沒有脫離布坎南的語族學。

本節從勞伊德、麥爾、布思談到了布坎南和卡姆登，討論了島名的爭議、不列顛古代各族的來源和移入先後，以及彼此間語言、文化與身體強弱的對比，這些都是十六世紀不列顛古史辯中的關鍵議題。對當時辯論的參與者而言，皆攸關國族身份認同及政治地位。雖然這場知識論戰中的參與者，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在知識建構上有明顯的共通之處：皆以「語言」為論證核心。信古派的勞伊德透過不列顛古語，證明島嶼及其居民的名稱皆源於自身，即古代布立吞人；也論證島民之名與特洛伊英雄布魯特斯的連結。只是，他的推論多倚賴語音上的相近性，而無大脈絡或多地的語言分析。與勞伊德對立的布坎南，則從古代希臘、羅馬文獻入手，指出高盧為不列顛島內各族群的起源地，並廣從歐陸與不列顛各地城鎮、河流、族群名稱中的相同字源，得出不列顛三族「都保有高盧語言不可磨滅的印記和親近性」。¹⁵²在古史立場上既駁斥勞伊德，又不完全贊同布坎南的卡姆登，也同樣注重從語言入手，他認為，要解決古文物研究者所關心的起源問題，「語言是此爭論中的主力」，也是「最準確的證據」；他相信「處於同一語言社群中的人，也會有同一起源」。¹⁵³以語言為論證核心的十六世紀不列顛古史辯，充分顯示了它與文藝復興學術思潮密切的關係。

¹⁵¹ Camden, *Britain*, B5v.

¹⁵²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03.

¹⁵³ Camden, *Britain*, B2v, B5v.

五、結語

本文從知識史的角度，特別是十六世紀古史辯的知識網絡及主要辯論議題，分析十六世紀蘇格蘭古史書寫的發展，並說明它在 1520 至 1580 年之間，如何受到文藝復興知識潮流及英蘇歷史書寫傳統的影響。本文雖以蘇格蘭古史為主體，但一直在英蘇古史辯的脈絡中討論，藉此指出十六世紀英蘇雙方的古史書寫，其實都在彼此交詰中推進，而且「辯論」本身即具有塑造知識的積極性意義，對蘇格蘭而言尤其如此。從十四至十六世紀，蘇格蘭史家的歷史書寫，基本上都是為了抗衡英格蘭勢力的擴張，或面對英格蘭宣稱的對蘇合法統治權。因此，他們必須重新詮釋源自於英格蘭的特洛伊傳說，也要補足斯科塔神話及上古君王世系的空白；他們必須梳理島嶼名稱的由來，連同族群的起源和遷移問題，以及古代不同族群間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他們的作品受到英格蘭史家如勞伊德的批判，也必須找到新的研究路徑反駁對方的批評，才有了布坎南的回擊。本文提及的蘇格蘭史家們，書寫的動機、關切的主要議題，都在回應英格蘭的壓力或處理與英格蘭的關係，企圖以「真實」的蘇格蘭古史，照亮國族的前途。所以，對他們而言，參與古史的辯論並不單純為了挖掘過去歷史的樣貌，而在於此刻的國族地位和未來的國家命運。

本文從辯論切入，可更清楚看到英蘇學者既有共享的、與歐陸相連的「文人共和國」，也因不同的政治需求和學術取徑而形成社群的分裂和競爭，如信古派和疑古派之分、古典語派和本土語派之別。但過往有關蘇格蘭歷史書寫研究中所在乎的國族認同，並非形成這些區隔的主要因素。例如，同樣屬於蘇格蘭國族派的布思和布坎南，並未選擇相同的知識建構方式，也在辯論網絡中站在不同的位置；屬不列

顛統一派的蘇格蘭史家麥爾，也未因嚮往英蘇統一，而選擇支持英方的特洛伊起源之說，或接受吟遊詩人所傳誦的亞瑟王傳奇。換言之，過去以國族認同建立的詮釋架構，並不足以完整理解十六世紀蘇格蘭古史書寫的發展；各學者建構古史知識的方式，其實是政治認同與學術思辨交錯的結果。

在辯論的脈絡下，也能讓我們看到學者間多元的關係型態，並非只有對抗或批評。¹⁵⁴以布思為例，他雖以反抗英格蘭古史為目的，卻大幅分享了英格蘭的古史知識，而且汲取其古史建構模式，轉用於蘇格蘭自身的古史傳說，撰述了自成一格且完整的國族記憶。再以布坎南為例，1570至1580年代他與英格蘭的疑古派學者之間有密切的交流，且此交流形塑了英格蘭古史知識發展的方向。這些英格蘭學者除了前文已提及的卡姆登之外，主要是圍繞著伊莉莎白女王的兩位廷臣——希德尼(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和達德利(Robert Dudley, Earl of Leicester, 1564–1588)所形成的學者圈。他們與布坎南同聲共氣，反對勞伊德所主張的古史，也時常透過信件表達對布坎南完成《蘇格蘭史》的期待。¹⁵⁵這派學者

¹⁵⁴ 過去的科學知識史研究，如謝平與夏佛的《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過度著重兩派學者間的對立，將霍布斯和波以耳之間的競爭關係，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form of life)，彼此壁壘分明。Shapin and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Chapter 5. 但近期的科學史研究，已開始關注不同學者如何走向合作之途，如達斯頓在2023年出版的《對手》中，以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十九世紀晚期，以及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背景所形成的三次重要科學合作，串起全書。此書的焦點其實不是標題所揭示的「對手」關係，而是科學領域的學者間所形成的合作關係。Daston, *Rivals*, 18.

¹⁵⁵ 此學術圈中時常與布坎南通信往來的學者，包括曾任駐蘇格蘭使節的蘭道夫(Thomas Randolph, 1523–1590)、駐尼德蘭使節羅傑斯(Daniel Rogers, c. 1538–1591)、教士布克利(Edward Bulkeley, c. 1540–c. 1621)及古德曼(Christopher Goodman, c. 1519–1603)等人。美國學者菲利普斯(James E. Phillips, 1912–1979)甚至認為，布坎南可視為此學術社群不在場的通訊社

宗教上傾向較激進的「清教主義」(Puritanism)，外交政策上主張向歐陸擴張，時常與保守派大臣西索(William Cecil, 1st Baron Burghley, 1520–1598)的學術圈有緊張關係。¹⁵⁶然而，布坎南對英格蘭學者的影響，卻跨越這兩個不同的學術社群，包括屬西索一派的卡姆登，以及屬希德尼陣營的著名文學家史賓賽(Edward Spenser, c. 1552–1599)。後者在 1598 年寫成的《愛爾蘭現狀評論》(*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 1633)中，大量採用布坎南語族學的成果，敘述愛爾蘭的民族源流與風俗習慣，同時也分享他的古史認識論，批判舊有神話傳說與口傳證據之薄弱。¹⁵⁷

這場十六世紀的不列顛古史辯，還有一個與過去科學知識史著作中所談的辯論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文藝復興知識特色。參與者不僅活在當下、不是只在一個實驗室內，或只與同時代的學者辯詰、協商、交流，而是不斷地跨越時代，有意識地與古代及中古的知識傳統對話，並以那些時代的權威作品和語言，做為建立知識可信性的根基。他們在與過往對話的過程中，也凸顯了文藝復興知識以語言為核心的特色：疑古派學者，從維吉爾到布坎南，都主張以拉丁文文獻為尊，以他們眼中高度文明化的古希臘、羅馬作品做為鑑別古史知識的準繩，也以此批判中古的偽知識；信古派學者，以勞伊德為代表，則更重視

員(*in absentia*)。Philips,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Sidney Circle.” 23–55.

¹⁵⁶ 西索一派與達德利一派的緊張關係，參見 Simon Adams, *Leicester and the Court: Essays in the Elizabethan Poli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23, 46–67.

¹⁵⁷ 史賓賽在作品中多次提及布坎南之名，並引用布坎南之研究成果。Edmund Spenser, *A View of the State of Ireland: From the First Printed Edition (1633)*, ed. Andrew Hadfield and Willy Maley (Oxford: Blackwell, 1997), 44–52. 雖然史賓賽的古史立場接近疑古派，但不妨礙他繼續使用布魯特斯和亞瑟王的傳奇在文學作品中，因而成就了他最著名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 1596)。

中古、在地的傳承，將本土語所留存的資料視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記載，並對古代文獻內容的真實性抱持懷疑。這兩派學者所實踐的，正是文藝復興時代建構「事實之事」(matters of fact)的方法。¹⁵⁸

在跨越時代的對話之外，古史書寫者也有明顯的現實性，為此刻，也為未來而寫。例如，布坎南在《蘇格蘭史》中保留了「佛格斯世系」(即佛格斯一世至二世，共 40 位蘇格蘭上古君主所代表的世系)，讓詹姆士六世時代的斯圖亞特王室(the Stuarts)，得以繼續溯源至西元前 330 年，維持蘇格蘭王室的獨立性。這一點雖然讓他受到現代史家崔佛-羅珀無情的批評，指責他在毫無證據的基礎上，沿襲舊說，使蘇格蘭古史繼續蒙上神話色彩。¹⁵⁹但正是在這一點上，布坎南才能在十七世紀「王位聯合」之後，具備長久的影響力。¹⁶⁰1603 年後，蘇格蘭知識分子面對可能喪失的國族獨立性，加上宮廷南遷，王室、宗教、法律、文化都漸有英格蘭化的趨勢，而感受到蘇格蘭利益可能被英格蘭吞噬，或被國王所遺忘的危機。因此，能支持蘇格蘭國族悠久性及獨立性的古史知識，格外受到重視；古代君王世系也由此成為十七世紀蘇格蘭國族認同的

¹⁵⁸ 這套建構「事實之事」或知識確定性的方法，在十七世紀之後逐漸改變。

參見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¹⁵⁹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55–72. 崔佛-羅珀對布坎南的批判，其實與他本人當時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他從 1970 年代起就明確反對蘇格蘭獨立或自治，這影響到他對十六世紀蘇格蘭歷史書寫的詮釋，也常以情緒性的語句批評布坎南。例如，他指責布坎南的一生「展現了凱爾特人的傲慢和反覆無常」。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35.

¹⁶⁰ 布坎南成為影響十七世紀蘇格蘭歷史知識最重要的史家，其影響力參見 Mason, “Scotching the Brut,” 77; Mason, “*Certain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alm of Scotland*,” 38–65.

要素。¹⁶¹延續布坎南之古史著述的蘇格蘭學者，如莫尼佩尼(John Monipennie, d. 1617)，他在王位聯合後立即出版《蘇格蘭王國要紀》(*Certeine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alme of Scotland*, 1603)，以布坎南的《蘇格蘭史》為模板，重述佛格斯世系，首頁即寫：「佛格斯一世，蘇格蘭第一位國王，……在創世後 3641 年、救世主耶穌降臨前 330 年開始統治。」¹⁶²接著介紹蘇格蘭貴族體制、教會組織、地理樣貌與風土民情等。作者刻意選擇在倫敦以英文出版此作，冀望英格蘭讀者能認識蘇格蘭悠久的歷史，不遜於英格蘭王國所傳承的布立吞人歷史。

莫尼佩尼後又於 1612 年在倫敦出版《蘇格蘭編年史簡要》(*The Abridgement or Summarie of the Scots Chronicles*)，獻給詹姆士六世，意在提醒國王及其他讀者，詹姆士王身上所流淌的悠久王室血脈，可追溯至古埃及。所以作者延續了布思的斯科塔傳說，講述斯科塔及其夫婿蓋提祿斯離開埃及，遷移至西班牙、愛爾蘭，其後代再移居蘇格蘭並建國的故事。¹⁶³這部編年史接著敘述上古歷代君王至詹姆士六世的歷史發展，其內容多取自布思及布坎南之作，而且也沿襲他們的政治修辭，強調蘇格蘭王國的自由與獨立。例如，莫尼佩尼在獻詞中對國王說：「古老的蘇格蘭王國，……在[過去]106 位國王的統治下，從未被征服，特別是幾乎整個世界都臣服在羅馬帝國的刀劍下時，」依然昂揚站立。¹⁶⁴

¹⁶¹ Keith M. Brown, "Scottish Identi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British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236–258.

¹⁶² John Monypennie, *Certeine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alme of Scotland* (London: Printed by A. Hatfield, 1603), B1r.

¹⁶³ John Monypennie, *The Abridgement or Summarie of the Scots Chronicles* (London: Printed at Brittanies Bursse by Iohn Budge and Simon Stafford, 1612), B1r. –2v.

¹⁶⁴ Monypennie, "The Epistle Dedicatorie," in *The Abridgement or Summarie of*

莫尼佩尼的作品可說是布坎南《蘇格蘭史》在文字上的再製，在文字之外，《蘇格蘭史》也有以圖像為媒介的轉製，可一窺十六世紀古史辯的知識成果，如何在十七世紀繼續發揮效用。例如強斯頓(John Johnston, c. 1565–1611)於 1602 年出版的詩文《蘇格蘭列王紀》(*Inscriptiones historicae regum Scotorum*)，依照布坎南所述之歷代君主編號，從佛格斯一世至詹姆士六世共 108 位，依序以簡短詩歌表彰他們的功蹟。此作最末再附上 10 幅君主肖像，從斯圖亞特家族第一位君主羅伯特二世(Robert II, 1371–1390 在位)至詹姆士六世及其王后。¹⁶⁵再如 1633 年時，因查理一世(Charles I, 1625–1649 在位)將在愛丁堡舉行進城禮及加冕禮，愛丁堡市政府委託蘇格蘭本土畫家傑姆森(George Jameson, c. 1587–1644)，繪製 109 幅歷代蘇格蘭君王肖像。它們如今僅留存 26 幅，¹⁶⁶但當時國王進城禮的裝飾設計、現場朗誦的詩歌，都還保留在詩人德拉蒙德(William Drummond of Harrthornden, 1585–1649)編寫的《至高尊貴之君查理的歡慶》(*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High and Mighty Monarch Charles*, 1633)中。書中處處表達了愛丁堡市政府對於國王返鄉的喜悅和深切的期許，並且透過傑姆森繪製的君王系列肖像，將現任國王與蘇格蘭歷代君主牢牢聯繫。這場進城禮本身，亦猶如一場盛大的古史動員，在各樣的節目中展現蘇格蘭臣民的忠誠，並提醒國王莫忘其蘇格蘭出身，也莫忽視蘇格蘭本土人民的利益。¹⁶⁷

the Scots Chronicles. 文中的 106 位君主，不包括在位的詹姆士六世及其母親蘇格蘭女王瑪麗。

¹⁶⁵ 強斯頓共列出 108 位蘇格蘭君主，但編號僅有 107 個，因詹姆士五世和瑪麗一世合用編號 106，詹姆士六世編號為 107。書中所附 10 幅君主肖像見 John Johnston, *Inscriptiones historicae regum Scotorum* (Amsteldami: Excudebat Cornelius Claessonius Andreae Hartio, 1602), H3r–K4r.

¹⁶⁶ 此 26 幅目錄，見 Duncan Thomson, *The Life and Art of George Jameso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95–100.

¹⁶⁷ William Drummond, *Entertainment of the High and Mighty Monarch Charles*

1633 年的古史動員及圖像轉製，並不是十七世紀最後一次。在 1684 年至 1686 年之間，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60–1685 在位)的蘇格蘭樞密院(Privy Council)，為整修荷里路德宮(Holyrood Palace)而委託荷蘭畫家雅各·德·魏特(Jacob de Wet II, c. 1641/1642–c. 1697)，繪製蘇格蘭歷代君王肖像，從佛格斯一世到查理二世及 1685 年即位的詹姆士七世暨二世(James VII & II, 1685–1688 在位)，共計 111 幅。德·魏特的畫作參考了蘇格蘭本土畫家傑姆森 1633 年的系列君王肖像，也參照布坎南的《蘇格蘭史》，並依其編列次序，再加上最近的三位君主。¹⁶⁸此系列肖像經歷十八世紀戰爭的破壞後，如今僅存 97 幅，收藏於愛丁堡荷里路德宮的「大畫廊」(the Great Gallery)。¹⁶⁹觀者依然可在此見到畫像上的歷代君主，有著相似的鼻型及相近的衣著風格，呈現抹除時代差異的相似性和五官樣貌的代代傳承，表達了斯圖亞特王朝繼承自佛格斯一世的悠久世系，也彰顯蘇格蘭政治與文明歷久彌新的樣貌。

這一次來自官方的古史動員，為復辟的斯圖亞特王室(the Stuart Restoration, 1660–1688)強化了王權的悠久性與連續性，也再次見證布坎南

King of Great Britaine, France, and Ireland, into His Auncient and Royall City of Edinbvrgh, the Fifteenth of Iune, 1633 (Printed at Edinbvrgh: By Iohn Wreittoun, 1633), B1r, B3v, C1r.

¹⁶⁸ E. McGrath, “Local Heroes: The Scottish Humanist Parnassus for Charles I,” in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al Renaissance: Essays in Honour of J. B. Trapp*, ed. E. Chaney and P. Mack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90), 257–270; Carla van de Puttelaar, *Scottish Portraiture 1644–1714: David and John Scougall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Publishers, 2021), 378.

¹⁶⁹ 圖像見：Royal Collection Trust, <https://www.rct.uk/resources/audio-description-the-great-gallery>; <https://www.rct.uk/collection/search#/19/collection/403322/fergus-i-king-of-scotland-330-305-b-c>, accessed June 30, 2025.

對十七世紀蘇格蘭政治圖像及宣傳的影響力。他所編列的 108 位君主，此時從國族神話變成了王權神話，¹⁷⁰成為斯圖亞特王朝表達其合法性的根據（雖然布坎南本人主張節制王權）。以後見之明來看，布坎南的確完成了他在《蘇格蘭史》中自定的使命：「讓我們古代的歷史免於神話傳說的不確定性，從不該有的消亡中拯救出來。」¹⁷¹他也以人文學者細密的證據蒐集和語言分析，充分論證不列顛島及蘇格蘭歷史的起源。然而，這項使命的促發、實踐及其成果，並非單在蘇格蘭歷史知識發展的背景下完成，而是在十六世紀不列顛古史辯的脈絡中寫成；其寫作方式與核心主題，皆是在與英格蘭古史書寫的競爭及與前輩蘇格蘭史家的對話中，脫胎成形。

（本文於 2025 年 3 月 6 日收稿；2025 年 8 月 10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不列顛古史辯：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古代史書寫」（計畫編號：111-2410-H-002-279-MY2）部分研究成果，曾在 2025 年 10 月 23 日發表於臺大歷史系講論會，誠摯感謝與會師生之指正，也感謝本文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的意見，使本文得以減少諸多疏漏。

¹⁷⁰ S. Bruce and S. Year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 The Restoration Portraits and the Kings of Scotland," in *The Making of Scotland: N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ed. David McDrone, Stephen Kendrick and Pat Stra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6.

¹⁷¹ Buchana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 “Bull of Pope Boniface.” In *Anglo-Scottish Relations 1174–1328: Some Selected Document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 L. G. Stones, 162–1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Letter of King Edward I to Pope Boniface VIII.” In *Anglo-Scottish Relations 1174–1328: Some Selected Document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 L. G. Stones, 192–2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The Pope and the Scottish Question.” In *Anglo-Scottish Relations 1174–1328: Some Selected Document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 L. G. Stones, 220–23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Bale, John. *The Laboryouse Journey [and] Serche of Iohan Leylande, for Englandes Antiquitees Geuen of Hym as a Newe Years Gyfte to Kyng Henry the Viij*. London: Printed S. Mierdman, 1549.
- Bede the Venerable. *Bede: The Reckoning of Time*. Translated by Faith Walli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edited by Bertram Colgrave and R. A. B. Mynors. Repri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Boece, Hector. *Scotorum historiae a prima gentis origine*. Paris, 1527.
- Boece, Hector. *The History and Chronicles of Scotland*. 2 vols. Translated by John Bellenden. Edinburgh: Reprinted for W. and C. Tait, 1821.
- Bower, Walter. *Scotichronicon*. 9 vols, edited by D. E. R. Watt. London: John Donald, 2022.
- Buchanan, George.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Vol. 1. Translated by James Aikman. Glasgow: Blackie, Fullarton & Co., 1827.
- Buchanan, George. *Vernacular Writings of George Buchanan*, edited by P. Hume Brown. Edinburgh and London: Printed by the Scottish Text Society by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92.
- Camden, William.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 Kingdomes,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the Ilands Adioyning, out of the Depth of Antiquitie.* Translated by Philémon Holland. London: Printed at Eliot's Court Press by George Bishop and John Norton, 1610.
- Drummond, William. *Entertainment of the High and Mighty Monarch Charles King of Great Britaine, France, and Ireland, into His Auncient and Royall City of Edinbvrgh, the Fifteenth of Iune, 1633.* Printed at Edinbvrgh: By Iohn Wreittoun, 1633.
- Faletra, Michael A. ed. and trans. "Appendix D: Early Responses to Geoffrey of Monmouth." In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218–238. Ontario: Broadview Editions, 2008.
-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Translated by Michael A. Faletra. Ontario: Broadview Edition, 2008.
- Holinshed, Raphael.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Chronicles.* 1586. First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Raphael Holinshed, William Harrison et al. Reprinted with manifold matters of singular note and worthie memorie by John Hooker alias Vowell Gent et al. London: Printed by Henry Denham, 1587.
- John of Fordu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Nation*, edited by William F. Skene. Translated by Felix J. H. Skene. Edinburgh: Edmonstaon and Douglas, 1872.
- Johnston, John. *Inscriptiones historicae regum Scotorum.* Amsteldami: Excudebat Cornelius Claessonius Andreae Hartio, 1602.
- Leland, John.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of the Original, Life, Actes, and Death of the Most Noble, Valiant, and Renoumed Prince Arthure.*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binson. London: Printed by Iohn Wolfe, 1582.
- Leland, John. *Assertio inclytissimi Arturij Regis Britanniae.* London: Printed by R. Wolfe, 1544.
- Leslie, John. *De origine, moribus, et rebus gestis Scotorum libri decem.* Romae: In aedibus populi Romani, 1578.
- Llwyd, Humphrey. *Commentarioli Britannicae descriptionis fragmentum.* Cologne, 1572.
- Llwyd, Humphrey. *Cronica Walliae*, edited by Ieuan M. Williams and J. Beverley Smith.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6.
- Llwyd, Humphrey.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as This Most Noble, and Renowmed Iland, Was of Auncient Time Deuided into Three Kingdomes, England, Scotlnad and Wales.* Translated by Thomas Twyne. London: By Richard Iohnes, 1573.

- Mair, John. *A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as well England as Scotland. Completed from the Ancient Authorities by John Major*. Translated by Archibald Constable. Edinburgh: Printe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892.
- Monypennie, John. "The Epistle Dedicatorie." In *The Abridgement or Summarie of the Scots Chronicles*. London: Printed at Brittanies Bursse by Iohn Budge and Simon Stafford, 1612.
- Monypennie, John. *Certeine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alme of Scotland*. London: Printed by A. Hatfield, 1603.
- Monypennie, John. *The Abridgement or Summarie of the Scots Chronicles*. London: Printed at Brittanies Bursse by Iohn Budge and Simon Stafford, 1612.
- Prise, John. *Historiae Brytannicae Defensio. A Defence of the British Histor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eri Davies. Oxford: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 Spenser, Edmund. *A View of the State of Ireland: From the First Printed Edition (1633)*, edited by Andrew Hadfield and Willy Maley. Oxford: Blackwell, 1997.
- 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The Annal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 edited by Moses Hadas. Translated by Alfred John Church and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3–416.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
- 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Agricola, Germania*. Translated by Harold Mattingly. Revis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 B. Riv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 Vergil, Polydore.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from an Early Translation Preserved among the MSS. of the Old Royal Library in the British Museum*, edited by Sir Henry Eli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Camden Society, 1864.

二、近人論著

-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1987。
- 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賽門·夏佛(Simon Schaffer)著，蔡佩君譯，〈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爾與實驗生活〉，臺北：行人出版，2006。
- 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
- Adams, Simon. *Leicester and the Court: Essays in the Elizabethan Poli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 Armitage, Davi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awcutt, Priscilla. "The Correspondence of Gavin Douglas." In *Stewart Style, 1513–1542: Essays on the Court of James V*, edited by Janet Hadley Williams, 52–61. East Lothian: Tuckwell Press, 1996.
- Brett, C. "John Leland, Wales, and Early British History." *Welsh History Review* 15 (1990): 169–182.
- Broadie, Alexander. *The Circle of John Mair: Logic and Logicians in Pre-Reformation Scot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 Broun, Dauvit. "A New Perspective on John of Fordun's *Chronica Gentis Scotorum* as a Medieval 'National History'." In *Rethinking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n Scotland: Essays in Honour of Roger A. Mason*, edited by Steven J. Reid, 43–60. Woodbridge: Boydell, 2024.
- Broun, Dauvit. "The Birth of Scottish History."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76:201 (April 1997): 4–22.
- Broun, Dauvit. "The Picts' Place in the Kingship's Past before John of Fordun." In *Scottish History: The Power of the Past*, edited by Edward J. Cowan and Richard J. Finlay, 11–28.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 Broun, Dauvit. *The Irish Identity of the Kingdom of the Scot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Woodbridge: Boydell, 1999.
- Brown, Keith M. "Scottish Identi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British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The Making of Britain 1533–1707*, edited by Brendan Bradshaw and Peter Roberts, 236–2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ruce, S., and S. Year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 The Restoration Portraits and the Kings of Scotland." In *The Making of Scotland: N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David McDrone, Stephen Kendrick and Pat Straw, 175–188.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urke, Peter.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1450–1700." *History and Theory* 5:2 (1966): 135–152.
- Burke, Peter.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Burke, Peter.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 Burke, Peter. *Ignorance: A Glob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 Burke, Peter.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 Burke, Pete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 Burns, J. H. *The True Law of Kingship: Concepts of Monarchy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Carley, James P. "Arthur and the Antiquaries." In *The Arthur of Medieval Latin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Arthurian Legend in Medieval Latin*, edited by Siân Echard, 149–178.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1.
- Carley, James P. "Polydore Vergil and John Leland on King Arthur: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Interpretations* 15:2 (Spring 1984): 86–100.
- Carley, James P., and Julia Crick. "Constructing Albion's Past: An Annotated Edition of *De Origine Gigantum*." In *Glastonbury Abbey and the Arthurian Tradition*, edited by James P. Carley, 347–418.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1.
- Celenza, Christopher S.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Celenza, Christopher S.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14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Cochrance, Eric.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 Collis, John.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Celts in Britain." In *Celtic Conne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eltic Studies, Volume I: Language, Literature, History, Culture*, edited by Willia Gillies, Ronald Black and Roibeard O Maolalaigh, 91–107. East Linton: Tuckwell Press, 1999.
- Cowan, Edward J. *'For Freedom Alone': The Declaration of Arbroath (1320)*. East Linton: Tuckwell, 2003.
- Cowan, Edward J., and Richard J. Finlay, eds. *Scottish History: The Power of the Pa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 Daston, Lorraine. *Rivals: How Scientists Learned to Cooperate*.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23.

- Davies, Ceri, and John E. Law, ed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Celtic Countries*. Oxford: Blackwell, 2005.
- Davies, Norman. "The Painted Isles, c. 600 BC–AD43." In *The Isles: A History*, 45–1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Davies, R. R.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Power and Identities in the British Isles 1093–13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Davies, R. R. *The Matter of Britain and the Matter of England: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9 February 199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Dawson, Jane. "The Gaidhealtach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cottish Highlands." In *British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The Making of Britain 1533–1707*, edited by Brendan Bradshaw and Peter Roberts, 259–3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Erskine, Caroline, and Roger A. Mason, eds. *George Buchanan: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Europe*. Farnham: Ashgate, 2012.
- Ferguson, William.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Picts." *Scottish Tradition* 16 (1990–1991): 18–32.
- Ferguson, William. "George Buchanan, Humanist and Historian." In *The Identity of the Scottish Nation: An Historic Quest*, 79–97.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 Ferguson, William. *The Identity of the Scottish Nation: An Historic Que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 Ford, Philip, and Roger P. H. Green, eds. *George Buchanan: Poet and Dramatist*. Swansea: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9.
- Foster, Sally M. *Picts, Gaels and Scots*. London: B. T. Batsford, 1996.
- Foucault, Michel.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 Mepham, and Kate Sop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 Fumaroli, Marc.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lated by Lara Vergnau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Geroulanos, Stefanos. *The Invention of Prehistory: Empire, Violence, and Our Obsession with Human Origins*.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24.
- Goldstein, R. James. "The Genealogy of Scotland: John of Fordun's *Chronica Gentis Scotorum*." In *The Matter of Scotl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Medieval Scotland*,

- 104–13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
- Goldstein, R. James. *The Matter of Scotl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Medieval Scotlan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
- Gruffydd, R. Geraint. “*Yny lhyvyr hwnn* (1546): The Earliest Welsh Printed Book.” *The Bulletin of the Board of Celtic Studies* 22, part 2 (May 1969): 105–116.
- Harris, Oliver D. “William Camden, Philemon Holland and the 1610 Translation of *Britannia*.”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95 (2015): 279–303.
- Hutson, Lorna. *England’s Insular Imagining: The Elizabethan Erasure of Scot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 Isaac, G. R. “Insular Celtic vs. Gallo-Brittonic: An Empirical or a Methodological Question?” In *Celtic Connections: Papers from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eltic Studies*. Vol. 2, edited by W. Gillies and D. W. Harding, 190–202.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05.
- Kelley, Donald R.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Language, Law and History in the French Renaiss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 Kendrick, T. D. *British Antiquity*. London: Methuen, 1950.
- Kidd, Colin. “The Gaelic Dilemma in Early Modern Scottish Political Culture.” In *British Identities Before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tlantic World 1600–1800*, 123–1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idd, Colin. *Subverting Scotland’s Past: Scottish Whig Historians and the Creation of an Anglo-British Identity, 1689–c.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atour, Bruno, and Steve Wooga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Levine, Joseph M. *Humanism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evy, F. J. *Tudor Histor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 Longino, Helen E. *The Fate of Knowled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Lynch, Michael. *Scotland: A New History*. London: Pimlico, 1992.
- MacDonald, A., Michael Lynch, and Ian B. Cowan, eds. *The Renaissance in Scotland: Studies in Literature,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Offered to John Durkan*. Leiden: E. J. Brill, 1994.

- Mason, Roger A. "Certeine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alme of Scotland: George Buchanan and Scottish Self-Fashioning at the Union of the Crowns."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92:1 (April 2013): 38–65.
- Mason, Roger A. "Civil Society and the Celts: Hector Boece,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Ancient Scottish Past." In *Scottish History: The Power of the Past*, edited by Edward J. Cowan and Richard J. Finlay, 95–11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ason, Roger A. "Dame Scotia and the Commonweal: Vernacular Humanism in *The Complaynt of Scotland* (1550)." *The Mediaeval Journal* 10:1 (2020): 129–150.
- Mason, Roger A. "Kingship, Nobility and Anglo-Scottish Union: John Mair's *Hi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1521)." *The Innes Review* 41:2 (Autumn 1990): 182–222.
- Mason, Roger A. "Rex Stoicus: George Buchanan, James VI and the Scottish Polit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Early Modern Scotland*, edited by John Dwyer, Roger A. Mason and Alexander Murdoch, 9–33.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82.
- Mason, Roger A. "Scotching the Brut: Politics, History and National Myth in Six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60–84.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1987.
- McGrath, E. "Local Heroes: The Scottish Humanist Parnassus for Charles I." In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al Renaissance: Essays in Honour of J. B. Trapp*, edited by E. Chaney and P. Mack, 257–270.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90.
- Meganck, Tine Luk. *Erudite Eyes: Friendship, Art and Erudition in the Network of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Boston: Brill, 2017.
- Mitchison, Rosalind. *A History of Scotland*. 3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Mottram, Stewart. "Reading the Rhetoric of Nationhood in Two Reformation Pamphlets by Richard Morison and Nichola Bodrugan." *Renaissance Studies* 19:4 (September 2005): 523–540.
- Parry, Graham. *The Trophies of Time: English Antiquaria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5.
- Phillips, James E.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Sidney Circl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12:1 (November 1948): 23–55.

- Philo, John Mark. "Tacitus, Hector Boece, and the Writing of Scottish History." *Scottish Literary Review* 12:2 (Autumn/Winter 2020): 111–136.
- Piggott, Stuart. *Ruins in a Landscape: Essays in Antiquarian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6.
- Pittock, Murray G. H.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The Stuart Myth and the Scottish Identity, 163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Puttelaar, Carla van de. *Scottish Portraiture 1644–1714: David and John Scougall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Publishers, 2021.
- Reid, Steven J., ed. *Rethinking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n Scotland: Essays in Honour of Roger A. Mason*.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24.
- Royan, Nicola with Dauvit Broun. "Versions of Scottish Nationhood, c. 850–1707." In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 Vol. 1, *From Columba to the Union (until 1707)*, edited by Thomas Owen Clancy and Murray Pittock, 168–18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 Royan, Nicola. "Hector Boece and the Question of Veremund." *The Innes Review* 52:1 (Spring 2001): 42–62.
- Rundle, David. "Humanism across Europe: The Structure of Contacts." In *Humanism in Fifteenth-Century Europe*, 307–335, edited by David Rundle. Oxford: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ediev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2012.
- Schaps, David. "The Found and Lost Manuscripts of Tacitus' *Agricola*." *Classical Philology* 74:1 (January 1979): 28–42.
- Schwyzler, Philip. "'Awake, Lovely Wale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 76–9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hapin, Steve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hapin, Steve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Shrank, Cathy. "John Leland and 'the Bowels of Antiquity'." In *Writing the Nation in Reformation England, 1530–1580*, 65–1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Terrell, Katherine H. "Subversive Histories: Strategies of Identity in Scottish Historiography."

- In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British Middle Ages*, edited by J. J. Cohen, 153–17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Thomson, Duncan. *The Life and Art of George Jameso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 Trevor-Roper, Hugh. *George Buchanan and the Ancient Scottish Constitution*. London: Longmans, 1966.
- Trevor-Roper, Hugh.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Myth and History*, edited by Jeremy J. Car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Waswo, Richard. “Our Ancestors, the Trojans: Invent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 *Exemplaria* 7 (1995): 269–290.
- Weiss, Roberto.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2nd e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 Williams, Glanmor, and Robert Owen Jones, eds. *The Celts and the Renaissanc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0.
- Williamson, Arthur H. “Scots, Indians and Empire: The Scottish Politics of Civilization 1519–1609.” *The Past and Present* 150 (February 1996): 46–83.
- Woolf, D. R. *The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三、網路資料

- 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Arbroath,” <https://www.nrscotland.gov.uk/learning-and-events/the-declaration-of-arbroath/transcription-of-the-declaration-of-arbroath/>. Accessed November 13, 2025.
- Royal Collection Trust, <https://www.rct.uk/resources/audio-description-the-great-gallery;> <https://www.rct.uk/collection/search#/19/collection/403322/fergus-i-king-of-scotland-330-305-b-c>. Accessed June 30, 2025.

The Debate of Ancient British Histo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Sixteenth-Century Scotland

May-shine 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reinterprets the writing of ancient Scottish histor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situates i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ransnational intellectual debates, analyzing its literary forms and core issues. It refers to this intellectual controversy as “the Debate of Ancient British History.” For Scottish historians, this debate was a defense of Scotland’s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of ancient Scottish history did not develop in isolation; rather, they evolved through opposition to and engagement with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shap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es the mobilization of ancient history in Scotland since the Middle Ages. The second examines the intellectual connections between sixteenth-century Scottish historians and scholars from England or continental Europe,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within this debate. The third focuses on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Renaissance scholarly background and their debates on language and textual sources. The fourth explores two key issues in the debate: the origins of island names and the process of major ethnic migrations. Rather than determining which version of ancient history is closer to historical truth, this article seek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s and methods through which historians enabled

ancient history to exert the “power of the past” in their own time.

Keywords: England, Scotland, historical writing, history of knowledge, origin myths